

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1977）

我是 1977 年生人。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重大基础建设都快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倡导的文章来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着就是 1978 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人心惶惶的社会气氛下，有办法的人当然都先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而台湾当局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该说，在更早的时候，从 1949 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人士始终站在国民党对立面，却如狗吠火车般无用，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虽然内外交加之下岛内形势风起云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那个“党即一切”的年代，社会上反国民党的声浪也从小涟漪成为小水波，越来越大，但国民党仍然坚持一贯的统治态度，因此

这几年风波不断，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里面。

我的生日在 11 月份，而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当年的 3 月 29 日。我年纪大一点儿时发现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动不动就爱跟我妈开玩笑：“乖乖，原来我是早产儿啊……”我妈那种保守的女人当然每次都被我逗得无话可说。

简单说一下我爸。他是台湾中部云林县人，云林在传统上（甚至现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乡下，传统的农业县。但也因为是较穷困的地方，所以民风也较彪悍，大家一提到云林，就不由得联想到黑道的故乡。而我妈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

我爸就跟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就到台北打拼，他本来在药厂做销售员，后来一直做到台湾北区的销售主管。在台湾高速公路刚建成，没什么私家车在跑，又被讥讽为养蚊场的年代，他就已经买了车子，算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从乡下来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妈，年轻时在台

南就自己开了一个打字行，刚好在我爸的台南总公司旁边，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在他们结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 1976 年，我爸已经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并住在台北士林的旧家，这是我 3 岁前住的地方。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王幸男邮包爆炸案”，对象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谢东闵，邮包炸伤了他的左手手指。这件震撼国民党党政高层的邮包爆炸案，据我高中时的老师回忆，在那指纹还无法用计算机辨识的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被动员去清查核对，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对全台湾已服役男子的指纹资料。就这样，几十万份资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来了，原来是一位叫王幸男的人所为。他因不满政治情势，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偏巧王幸男家的药厂，就是我爸工作的药厂。

据我老爸回忆，他某天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弄清他们身份后，我老爸就被带进某个地方喝茶，接着就是兄弟有几入、有没有女朋友、在教会干吗（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徒了）、药厂都在做什么之类铺天盖地的问题。好几个人轮流问了

24 小时，最后我老爸写了保证书后才让出来。事后他才知道，那时候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问过话了。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做国民党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这样入了党。

所以，现在在台湾问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只不过极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前不久，

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还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1978）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

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会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②（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③（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④（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公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

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

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

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注：

①于右任，著名国学家、政治家、书法家。

②吴三联，著名办报人。

③赵元任，语言学家，政治家。

④赵丽莲，著名英语教育家

《我明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3)

(长篇) 1979 我的家庭

1979 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 月 1 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 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 28 岁、女 25 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五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

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美国国务卿赴台“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

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①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攻大陆”

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 1983 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4）

1980 台湾当年的电视台

美丽岛事件以及来年的大审，绝对是影响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一件大事，不管是当初给台湾人民的震撼力，还是后来对当事人、辩护律师们的未来发展，都影响重大。

我当年还小，没什么感觉，很多事都是后来从长辈口中听来的。那个年代小道消息特别多。当然啦，当局控制着几个不自由、无法满足人民知情欲望的媒

体，社会上小道消息或谣言自然传得就快。在开放电视频道以前，台湾的无线电视台只有三个：

台湾电视台，简称台视，是台湾省政府所有的，也是台湾第一个电视台，所以常常会看到一些农渔民情报道，那时普遍认为台视的报道会稍微客观一点儿。

“中国电视台”，简称中视，是国民党所有，所以很多都是国民党活动内容，内容嘛，在以前也比较“忠党爱国”一点儿。

中华电视台，简称华视，是军方所有，所以每周四都会有所谓的“莒光园地”，部队里的阿兵哥每周四都必看这个节目，接受一下洗脑，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在补眠，一直到美女主持人又出现为止。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电视收视率最高，也是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闽南语布袋戏“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布袋戏是一种人偶戏，当时在中午时段播出。一到中午，街道空无一人，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后来因为实在太猛太轰动，据说当局以“妨碍工商活动”之名给禁播了。

话说回来，虽然当时台湾有这三个电视台，但在那个“党领导一切”的时代，报道的内容都是审核过的，大同小异。不过这三家电视台也保持着既竞争又

合作的关系，比如当局重大庆典时就来个联播，三台各派出当家主播和主持人负责一个部分。而三台节目又各有特长，比如说台视长于新闻，现在很多有线新闻台的主管最早都是台视出来的。中视长于戏剧，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就是中视推出的，许多大陆朋友熟悉的琼瑶剧，如《梅花三弄》、《还珠格格》也都是中视播出的。不过这几年很多剧都外包给大陆，或为了节省成本，索性直接买大陆剧来播，算弱掉了。华视虽然是军方所有，但长于综艺节目，从前到现在一直如此，许多名主持如张小燕、胡瓜等人，也都是在华视发迹的。

离题了，下面来说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除了国民党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也都会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国民党，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国民党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的意义而

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和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表面上，法律赋予大家有集会结社自由，但解释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手上。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有所谓“动员戡乱”体制，“国会”完全不让台湾人民改选，直到 1969 年之后，经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当时，“国会”成员几乎都是一些 1949 年跟着来台，代表台湾各省的议员。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慢慢开始老死，终于有了替补的空缺，党外异议人士终于有进入体制内发言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简直就是球员兼裁判，规则怎么玩都

是他们定的，一般人怎么能玩得过他们呢！所以，国民党跟党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这时的反对运动跟更早期的不太一样，不是松散的书生论政，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另外，“反攻大陆”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现实，所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及 1949 年后国民党带来的外省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性及政治权利分配性，也开始不断被挑战。因此，台湾本地的政治精英人物开始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

1979 年，一本叫《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这是由一群来自各地党外人士所创办的，一时精英聚集，大有政团之势。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

《美丽岛》的模式是到处设分社，每设一处分社就在当地办演讲，大受民众欢迎，但不容见于官方。

《美丽岛》高雄分社在当年 12 月 10 号国际人权日举办游行活动，不料却引发严重的警民大暴走，冲突规模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

直到现在，发生冲突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很多人说是当局派人在民众里当托，故意攻击警察，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人敢证实。

在这次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数被逮捕，当时台湾的反对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5)

1980 “美丽岛大审” 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一切似乎都开始焕然一新，国民党在台湾的严密体制也开始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一切都要从这年的美丽岛事件大审开始。

《美丽岛》杂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当时党外参与者皆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所以这次运动的悲剧色彩颇为浓烈。这个“政团”可说是瓦解了。经过审判后，核心八人通通被判“叛乱”，分别是黄信介、施明德、

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被判有罪是可预期的，但其影响及后坐力是相当大的。这次审判不仅引起全台湾民众的关心，国外的人权团体及媒体也很关心。国民党为了展示开明作风，虽然这是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但也没像以往做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可找到判决及答辩全文。虽然法庭上摆满了袭警的“证物”，但这些答辩，已经不仅仅在于“是否有袭警”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定位的政治层面。法庭似乎变成了他们的政见会场，一个个轮流侃侃而谈。

有一个关于“美丽岛大审”的笑话是这样的：当年美丽岛军法大审时吕秀莲有一条罪名是说了“打拼”两个字，这两个字在闽南语里是努力、奋斗的意思，但当时的军事法官不懂闽南语——“又打又拼，这不是叛乱是什么？”于是又罪加一等了。

因为信息如此透明，这些言论也为台湾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课。的确，这些言论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虽然在当初被视为洪水猛兽，倡议者也被冠以“叛乱分子”、“野心分子”等恶名，但这些诉求在 30 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美丽岛军事大审”的同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湾的灭门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当时正在接受大审的主嫌之一林义雄。在2月28日这天，他的母亲在自宅被人刺了13刀，七岁的双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丧命，而长女被刺六刀重伤，后经急救脱险，林义雄的妻子则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此案震惊海内外。凶手手法极为专业，以短刺刀捅入，接着横向反钩，刀刀置人于死地。

因为时间正好在大审的敏感期间，又因刚好是2月28日，因此很难不让人往政治谋杀的方向联想。当然，就算真的是国民党干的，他们也不会承认，因此警方设定为“国际阴谋集团”的罪行。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林宅血案是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运动，所采取的杀鸡儆猴的血腥示警手段，旨在警告所有台湾人，挑战国民党权威者，必将在台湾重演“二二八”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联想缺乏证据又太过主观，但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理由似乎又成为最合理的解释，警方当初侦办的方向反倒显得荒谬不堪。

后来林义雄还在狱里，林家生活困难想把房子卖掉，但没人敢买，直到长老教会将它买了下来作为教会来使用。每年的2月28日，除了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大家免不了想到的就是林宅血案。每年在这里也办纪念的音乐会，总是上新闻。但林宅血案终究成了悬案，到现在还没破案。每次一说到这件事，年纪稍长的人总是变得很沉重。在台湾，不分政治立场，对林义雄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称之为“人格者”（闽南语，人格崇高者），总觉得台湾亏欠林义雄很多。

在另一方面，这次美丽岛事件审判的辩护律师团里，也都是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可预见的审判，但他们经过不断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次审判后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后来反对运动的中坚，甚至风云际会成为政治场上的要角，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辩护，几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而在国民党一方，当时负责给政府化装的“新闻局长”就是宋楚瑜，他在那时是国民党栽培的明日之星，他

也很尽责地做好一个发言人的角色。而后来几十年里，两方中坚分子的不断交锋，恩恩怨怨纠缠了几十年，双方人马在政坛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故事好不精彩，留着慢慢说。

现在台湾蓝、绿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加速开放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台湾经济发展牵动的参政意识，以及要求资讯的流通，均使政治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正是以前那些人敢于争取，现在台湾才有吵吵闹闹的机会。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6）

1981 幼稚园时光，童年的“双十节”

我开始稍微有一点儿记忆的时候，我们家也从租的旧家，搬到新家去了。新家在水泥市的天母地区，阳明山脚下。这本来是买给爷爷奶奶住的，但他们住不习惯，又回云林老家去了。天母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在美军还没撤防台湾前，是一些军官的宿舍，到现在附近都还有一些当初留下的美式平房。我爸买的那间房，算是这个地区的第一栋高楼，一买就是近两

百平方米，但那时候也不贵，就买下了，谁知道过几年麦当劳在这边开了之后，整个房价都飙升起来。

反正我们刚搬来时，附近都还有农田、木材场，空气还不错，也挺清静的，还有令人印象深刻、能用流利英文跟老外聊天的卖甜品的老太婆。

这时，我也开始意识到妹妹对我向父母争宠的威胁性，因此开始故意欺负她，唉，小孩子的劣根性真是……三四岁时，我也被丢进幼稚园里了。幼稚园是一间教会办孤儿院的场地，因此相当大，整天在那边跑跑跳跳，好不开心。

幼稚园没什么回忆，只记得整天都是玩和吃，反正就是尽干一些老师看了会脑充血的蠢事，比如拿爆竹炸大便、掀女生裙子之类。

每逢十月，整个社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多么美好的十月，当初号称“光辉十月”，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提了。十月接连着有“双十节”、“台湾光复节”，以及蒋公诞辰纪念日等值得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个月到处都是旗海飘扬，电视上也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总之，十月就“尽量”没有天灾人祸，也“尽量”没有社会事件。不过后来等到李登辉上台时，有一年双

十节当天早上一架军机在台北机场摔了，就看到当年整场典礼上李登辉一脸大便样。

到了“双十节”这一天，三台各自都排出最强阵容的主播来播报新闻，有的台安排十个主播同时上阵。另外一台不甘示弱“拼场”，硬是凑了 20 个主播分个三排坐着轮流播报。当然，三台有几年也是联播，三台的当家主播就一起出现在这种坐三排轮播的新闻中了。整个十月，大街小巷庆祝节日的牌楼、标语，使整个城市红彤彤的，尤其是“总统府”前的介寿路，都会搭一个代表双十的“十十”状牌楼，并把整个牌楼点满璀璨的灯火。每一年的双十牌楼点灯都是件大事，吸引了各处来的人潮观看。除了过年，应该就属这个时候最热闹了。而对小朋友来说，十月的假特别多，所以也特别期待。

“双十节”，或蒋公诞辰，小朋友们都要拿着自己做的小旗以及标语到附近街道小小地游行一下，唱着一些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意思的歌。前面总有个小朋友在敲着鼓，大家如远足般嘻嘻哈哈地走着；大人也拍手欢迎，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语幼稚园喜欢在万圣节到外面商店搞“不给糖就捣乱”的活动，反正小朋

友也不知道是什么。这种所谓的“政治教育”，目的虽严肃，但小朋友们就是喜欢，能出去走走总是好的。

这一年黛安娜下嫁查尔斯，经过电视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场王子和公主的梦幻婚礼，我爸也为之倾倒。尤其是黛安娜的那个优雅发型，成为台湾男士们的最爱，后来有好一阵子，我爸都一直在怂恿我娘去做成那发型。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7）

1981 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台湾进入 1981 年了。

因为 1979 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并以政局不稳的理由暂停选举，直到美丽岛大审后才又恢复。当时的美丽岛人士均被关在牢里，但相关人士均积极投入选举，如家属纷纷打出“为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均高票当选。而一些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谢长廷和陈水扁，均当选台北市议员，而且是在我家这边的第一选区。

他们两人既合作又竞争、亦敌亦友的“情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政府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虽然还没有正式组党，但这些党外人士以“党外候选人推荐会”的名义纷纷推出候选人，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总是喜欢带着我“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除了候选人本身的演讲外，所谓的名嘴助阵也是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名嘴们常常妙语生花，讥讽政府，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这些场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政见会的原意，倒不是说那时候民众已经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真的支持他们，而是这些场子反而给有些民众压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这些党外的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

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A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既然以前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那么不爽，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什么大反抗，基层投票时，国民党的支持率还是那么高呢？如果这全部都归咎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那就错了。其实国民党要的只是政治的绝对权力，至于基层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管理。比如在台湾的各乡镇，就算是偏远地区，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其实说白了就是乡党部。平时服务些什么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选举时期，这里就变成了各乡镇动员、固桩，甚至买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网已经绵密到从里长、农渔会、姓氏宗亲会，到各式公会、公营事业、眷村、

部队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组。当时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建立，所以这些绵密的组织网在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时，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国民党一直擅长打这种组织战让自己的候选人上台，而长久与地方政治势力建立下来的关系，更是党外人士难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邓小平谈话指出，“叶九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共产党要“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而这一年，“叶九条”的提出，以及来年廖承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蒋经国的反应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岸那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虽然不直接接触，但又隔空交火放话，前线金门的炮战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继续开而已。除了两边的广播互相“感召”对方之外，台湾这边又喜欢放一些热气球到大陆去，里面大概放了些宣传单，或者是手表、收音机、罐头之类。当然，大多数时候政府不会直接出面施放，而是

一些“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这些空飘气球，如果气流算得准，飘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近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8）

1981 陈文成命案

这件事与前一年的林宅血案，算是当年的两大政治悬案。陈文成是台湾赴海外留学的学者，后在卡内基美隆大学任教，亦取得美国九级精算师资格，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人物。

1981 年 7 月，陈文成从美国回台探亲。那个年代的海外学生，对岛内的反对运动都多少有些支持，陈文成回台后，就因为曾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警备总部，这是个几十年来让台湾人闻之色变的机关。警备总部全称是警备总司令部，其实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就有这个机关了。在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担负治安、民防、动员任务，并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务，部分角色与今天的警察类同，

但其权力又远远凌驾于警察之上，可说是当时时空下所产生的不符体制而出现的怪物。因其业务可说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警备总部的业务深入民众生活各层面，严密监控着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宁可错杀一百”的统治心理下，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实，这有点儿类似秘密警察机关了。

我爸回忆说，当初带他去某个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备总部的人。过去台湾有句很有名的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可见“警总”对台湾人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及影响。

陈文成夫妇照片

回到正题，陈文成遭警总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而台湾那几年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上又一直不怎么好，所以这件事连美国国会都被惊动，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虐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总干

的，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找不到，当时的政府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成为悬案之一。

但这件事的影响，使大家开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学生特务的问题。台湾称其为“职业学生”，大部分都是领了国民党中山奖学金离开台湾去留学的学生，另外也负有监视其他学生的任务，打小报告。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近 30 年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9）

1981 《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儿园中班的年纪，妹妹也跟着上小班了。她跟个拖油瓶一样黏着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给丢了，她又在那边哇哇大哭。

我开始带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会帮我复习。有篇讲蒋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给我听，念着念着，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着念，仿佛听到爸爸嘴里发出“哼”的一声。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事。所以啦，那时候总是听爸爸他们在讨论政治，蒋介石来蒋经国去的。一天，我

也突然说：“那个蒋介石……”爸爸一听大惊：“小孩子不要乱学。”

1982年，影响台湾社会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剧《楚留香》的播放。这是第一部正式引进台湾电视台的港剧。在那个只有三个台的年代，这部剧居然创下70%的超高收视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礼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关了，出租车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回家看《楚留香》。

也难怪，当初台湾电视剧的水准实在太烂。以早期台湾的武打剧来说，拍摄非常粗糙，全是简陋的棚内景。这还不算，比如插个几根茅草，一个人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请自行想象舞台剧的风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边互绕圈边废话一堆，讲个十来分钟后，真正交手仅花三秒钟，真是让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简直被那精美的制作、流畅的剧情所征服。之后，大量港剧被引进，只要有一个台播港剧，其他两台收视一定惨兮兮。

《楚留香》影响到了各种层面。各种以“留香”、“无花”为名的餐饮茶艺馆开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业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为男人都要赶回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虽然不会粤语，但一定都会唱主题曲的最后一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玩游戏时最常用的招式变成了“弹指神功”，其实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弹出去而已。后来，那首“千山我独行.....”（老实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歌名）也变成了出殡送葬一定会演奏的曲目。

后来许多台湾艺人群起抗议港剧的侵略，说是造成工作机会受到威胁。而政府也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甚至规定港剧只能播四个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经那么轰动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了，社会上恐怕会暴动吧！就因为这条例的限制，中视在播到一半之后，只好继续将《楚留香》版权转移给华视，真是太便宜华视了。

同时，因为港产武侠剧实在太轰动，因此当局又把它给禁掉。但当时，VHS 规格及 BETA 规格的录影带开始流行起来，许多出租店也开始出租盗版的港剧，

因此大家纷纷到出租店租港剧了。台湾有个年代电视台，当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剧录影带而起家的。

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

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说，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们心里噤声，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

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医科。到国民党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为甚，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喜欢女儿嫁医师。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谓的地方士绅，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员，或者是一些考过科举的秀才及比较有学问的人，让他们来带领地方的发展。一直到了日据时代，因没有科举考试，所以地方士绅就变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担任，如医生、老师、农改人员之类的。早期台湾受尊敬的职业，除了医生之外，还有老师。在比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会被期待往医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会被期待往老师方向发展。当然，老师及医生的组合那简直就是金童玉女了，这也符合过去家庭的价值观。

所以，从这个历史因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赞助者都是南部的医界人士。

另一方面，传统台湾人对法律、司法之类的职业就比较有负面态度了，因为台湾人传统上多数不信任司法是够客观公正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而律师则被视为是一种不太有道德的职业，只会耍嘴皮子，为了混口饭吃，黑的也要讲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义感，也有可能被对方在法庭外报复，因此老一辈的人会认为当律师有损阴德，不算是好职业。这些观念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原因。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近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0）

1982 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支吾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的回答充满了禅机，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 20 世纪 70 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对话几乎都是讲闽南语。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国语，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说是他没逼我好好学闽南语。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四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少数民族（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这两个族群几百年来也是嫌隙不断，过去还常有一些族群及村庄间“械斗”的事情发生。不仅闽客之间会械斗，闽南间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械斗，惨烈的情况也令人发指。早期台湾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拳头师”，就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师，因为在械斗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这些武师练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鹤拳之类实战性攻击性较强的拳法。他们还要负责带领一些乡勇练武保卫乡里，所以现在台湾民间常有一些如宋江阵之类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从过去械斗中的作战

阵形中演化出来的活动。台湾乡间还有许多的“有应公庙”，其实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斗而亡的无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实他们本来是住在平地的，但汉人来了之后他们被赶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汉人之间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常械斗，客家人因人口较少处于劣势，也被赶离平地，所以在台湾的客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区为多。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1949年前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来台，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

局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因此，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县市，闽南语说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着有趣的昵称：“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配发了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成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

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卖大馒头之类的话；或者，他们也只当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物材料做出来的。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 90 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劫案”，不仅是震惊全台的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令人瞩目。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现在都一直被人当做案例提起。

李师科案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 1949 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可他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枪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时争相模仿，然后当警察的小朋友一定会说：“李师科！看你往哪里跑！”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被大家当做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抢银行真的是件轰动的新闻。在后来几年，社会上还常常有种说法：从李师科那时候开始……搞得好像台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李师科前”和“李师科后”两个时代似的，让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称“人类

的历史可分为尼采前及尼采后”，原来李师科在民间的历史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啊！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人一样。在过去的台湾，很习惯用“忠党爱国”、“绝对服从”等符号来定义这群老兵。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相结合。但在背后，有多少渺小的个体在时代中呼喊着想无奈。原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开放，才知道有相当的部分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开始散布到民间各个角落。有些原“青年军”，因加入部队失学，退伍后继续苦读，等到四五十岁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横公路有一个长春祠，即是纪念这些殉职人员的。中横公路最险峻的景点太鲁阁段，是一个大理石峡谷，一直是台湾的知名景点之一，若到过一次即知道当年施工的艰难。台湾有个公营的工程单位“荣民工程处”，简称“荣工处”，最早这个单位的业务就是把这些荣民组织起来，专门承包一些重大又艰难的工程，也算让这些荣民用劳动换取酬劳。而许多施工人员，等工程结束后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几十人或几百人一伙，开设了农场。像台湾特别有名的在中横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贵的梨山梨，这些东西的种植基础就是他们立下的。

但更多的荣民，因为没有谋生的技能，在退伍后或工程结束后，只能散布到社会最基层，做些最不起眼，

但也必须有人做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点心小贩、清洁队队员、出租车司机或保安工友等。

当初那些荣民参与的工程，最早的目的大部分还是军事用途，但长远看来还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推动力，所以这些荣民对台湾建设的功劳可说是相当大。但是在台湾经济进步的脚步中，他们仍然像是被牺牲的一群，大部分都晚景凄凉，少有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文坛大量作品都是在讨论外省老兵议题，这都是从李师科案后开始引发的思考。几十年来他们的肉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李师科效应在社会上的影响，使有阵子银行抢劫案大增，估计也是受新闻影响，因此被关注了很久。老兵的话题，在那一阵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近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1）

1982 我在教会里

因为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从有记忆起，每个礼拜天我就跟着父母到教会乖乖地做礼拜。但是年纪小怎么坐得住呢？所以我总是会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结束。

也许我从出生就逃脱不了教会的“魔掌”。我是在礼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爸还正好在教会里讲道；紧接着 12 月，才刚满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稣诞生里的小耶稣；而依长老教会的习惯，婴儿就应该带到教堂里，接受牧师的婴儿洗礼，所以等到我发现自己有记忆时，我已经坐在礼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说我是个在教会里长大的人，一点儿也不为过。

后来，爸爸因为太热心教会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专心跑去传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为教会里大家瞩目的对象，大家都认为像我这样的小孩肯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对于教会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我简直是无一不参加，举凡唱歌、背诵、朗读、画图比赛，或是母亲节、复活节、圣诞节的合唱演戏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儿。只要有这些活动，妈妈一定第一个帮我报名。结果有一年，我终于大暴走，在朗诵比赛及作文比赛

里面开始大骂，抒发我的不满，引起整个教会的轩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妈。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家里第一个信基督教的，所以热心，渴慕，虔诚。不过，这样逼我，让我越来越郁闷，也越来越反叛。

忘了说，我所在的是全称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旗下的一个教会。是台湾众多教会支派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以闽南语为主的教团。基督新教在台湾有许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国外不同教派教会的传教士传进来的，主要有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门诺会等。其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数最多的一个派别，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苏格兰的传教士传进台湾，借由办医疗及社会福利事业而慢慢将基督教传开来，到现在长老教会已可说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说到台湾的民主运动，也不可不提长老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经过一百多年，已经跟台湾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简直就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许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长老教会出身。而长老教会这种加尔文（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识，因此，当长老教

会见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现象”，就不断地声援党外运动。这样一个拥有大批信徒资产、好几间学校及医院的庞大教团，自然会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所以国民党当时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渗透、分化长老会内部，不停丑化长老教会——因为教会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国际阴谋集团”这个高帽子。不过国民党的一些手段，如烧毁罗马字圣经及没收教会通讯报纸的行为，也的确引起国际的关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为这些原因，那几年长老教会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轻一点儿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这种教会里成长的。当然啦，现在教会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激情了。

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2年，令幼小年纪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几乎成为那一年的流行语。后来约二十年后，《ET》数码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温旧梦。

也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际大战》（STAR WAR，大陆译为《星球大战》），第一次看到X战机和钛战机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两部电影影响我爱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记忆以后第一部看的电影却是《大白鲨》，而且看了好几次。再加上那时电视播了《泰坦尼克号沉没记》（大陆译为《冰海沉船》），让我对海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至今我到海边玩都还不敢到超过肚子以上的地方。

这一年台湾电影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几个年轻导演的新浪潮运动，影响了后来电影的发展。不过那时我年纪还小，要等到几年后才知道它的意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去世了，全家都赶回云林的老家，一整个大家族挤在那间日式榻榻米的房子里。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后来爸爸又传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传教为传福音）给爷爷，爷爷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个出殡前的晚上，整个家族还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挤在摆了爷爷棺材的房间里，几乎是爸爸主导了整个以基督教仪式守灵的过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厚的乡下，爸爸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坚持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顽皮得坐不住，动不动就攀上去看爷爷的遗体。第一次如此面对死亡这件事，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也不觉得可怕。当晚，整家子就睡在那个房间里。

第二天，整个殡葬的队伍由乐队前导，再来是灵车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到了教会。在乡下，这样的出殡仪式算是很常见的。说是乐队，其实也就是几个中老年人穿着不怎么整齐笔挺的军装，吹着不怎么样的音乐。关于这种送葬乐队，闽南语有个俗称“西索米”，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滥竽充数，大概也只会吹 SiSoMi 三个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场的家庭，在灵车队伍后面还会请电子琴花车。这是一种台湾的特殊文化，即那辆车装饰得华丽无比，后面有个小舞台，可能还会有艳舞女郎配合着电子琴声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所以出殡队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齐的乐队声，中间是请来的孝女哭声，后面跟着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电子琴花车歌声，最后面可能跟着一群看艳舞女郎的民众。

总之，这场丧礼在教会举行，称为告别式。爸爸的兄弟姐妹们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还是没什么概念，站在另一边乱看。在教会告别式结束

后，人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爷爷的棺材被降到那个坑中，然后被沙石填了起来。

后来几年，每逢跟着父母去扫墓，因为那墓地是如一个个水泥高台般葬着一个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欢在那些墓上跳来跳去，也免不了招来父母一阵骂。

虽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回老家，也不一定会跟彼此说已经回去过，但只要在爷爷的墓上看到那里的花新换过，就会因有人来过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义。

以前小时候每当寒暑假，爸爸总把我跟妹妹带到云林乡下去住几天，过几天再来，又带我们继续南下到台南的妈妈娘家住几天，这几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课。在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是传统的农业县，散布了几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糖厂。爷爷以前就是糖厂员工，所以这宅算是员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员工的，后来换台湾员工住。

爷爷死后，那间房就只剩奶奶一个人住。她的儿女们几乎都跑到台北来，只有她坚持不走，每天就在后院养些鸭子。后来她终于也来到台北，而过了十几年后我再去看那间房子，已经几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烟蔓草间。

小的时候，牙齿也不断在汰旧换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动要长出，旧牙摇摇欲坠时，就该拔牙了。不知道为什么，拔牙的事情总是在过年回到这宅子时发生，于是，总是在众亲戚的鼓励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条缝衣线，绑成一个圈套在牙齿上，然后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他还以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过还挺有效的。

应该说，很多 20 世纪 70 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寒、暑假回中南部乡下的回忆。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2）

1983 “六义士”劫机

1983 年 5 月，一架大陆的民航机，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南韩”。参与这次劫机的六名青年降落“南韩”后，立刻表示要投奔台湾。当时台湾当局在反共意识形态挂帅之下，并未依国际反劫机公约将他们视为“劫机犯”，反而称他们为“夺机六义士”。本来劫机者是要受到“南韩”政府审判的，台湾当局却动员一切力量声援他们（包括在“南韩”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等）。

经过“南韩”拘留、起诉、判刑确定，并羁押了一年三个月后，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喧嚣，劫机者被悄悄遣送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的第二天，立即被蒋经国接见而成为“反共英雄”。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颁发给他们约1700万台币的奖金作为生活费，还安排他们就业与就学，可谓风光一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淡忘掉，随着时代的改变，英雄的光环也已不在。再之后的劫机者也改由人机分离的方式处理，飞机先送回去，人则当做劫机犯先在台湾关个几年，然后遣送回大陆。

再听到“六义士”这个词，已经是1992年了。“六义士”其中之一的卓长仁投资地产赚了钱，却在转投资其他时血本无归，犯下了绑架案并撕票，被判死刑，拖了十年后才执行。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3）

1984 上小学

1984 年的 3 月，发生了一件“萤桥小学学生被泼洒硫酸事件”，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可怜的同学叫官声彦。

上一年级前的暑假，我又回到乡下老家去，在乡下那台收讯不是很清晰的破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看着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艾奎诺·科拉蓉回国在机场被刺的画面。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风扇一边嘎嘎地吹，大家一边坐在榻榻米上讨论这件事。台湾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是因为艾奎诺当时就是从台北乘中华航空的班机回菲，在机舱门口下楼梯时就被打了一枪。他倒下的那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一直忘不了。

没想到两年以后马科斯就下台了，我又在同一台电视机上看到艾奎诺·科拉蓉夫人上台。

这一年，我上了小学。其实像我这种 11 月生的，应该是在来年 9 月才进小学才对，但关心孩子者如我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当年就把我弄进小学。方法是，找个认识的小学校长，先把我弄进去读三天，然后再转到我家旁边的小学。因为那间学校在阳明山上，所以，我还记得那三天我妈每天都带着我坐公交车上山的情景。

上小学后，我开始学钢琴，一直弹到我上中学为止。学钢琴是个很痛苦的回忆，因为那个老师特别严格，一发现我弹错，一块小木板马上就向手背打了下去，也不管弹完了没！

当时台湾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父母喜欢把小孩送去学各种才艺：英文、音乐、画图是基本的，可能还有什么心算、珠算、功文、数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父母在弥补自己以前无法学这些东西的缺憾，就是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一开始冲太快又有什么用？

上小学，我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乖乖的，进到学校里见到蒋介石铜像都要鞠个躬才继续走，而且不能走过之后朝着蒋介石的屁股敬礼，否则会被骂。

学校也开始规定上学要讲国语，如果被发现讲闽南语要被罚。所以，小孩为了向大人争宠而暗生的劣根性也在这时出现了，各种打小报告的人纷纷出现。但小孩子就是笨，老师听了其实也不会太在意，只是笑笑而已。

一般小学的班级里，会有一些干部，除了班长副班长外，还有如——

风纪股长：就是抓你不守规矩，是大人的党羽。

学艺股长：其实就是帮老师收簿子。

卫生股长：检查每天早晚扫地有没有扫干净，并分配打扫区域的。

总务股长：收班费的。

.....

除此之外还有值日生，一天两名，也就是下课擦黑板，提水桶，帮老师倒茶等杂事。

每节课就在老师走上讲台，然后大家喊“老师好”，老师说“各位小朋友好”的仪式后开始，然后下课前也会重复敬礼一次：“谢谢老师！”其实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人都还不错，也不会跟小朋友计较太多。

那时候，老师说的话简直就跟圣旨没什么两样，小朋友开口闭口就是“老师说”。老师总是说“小朋友不可以穿越马路哦，有斑马线要走斑马线.....”后来大一点儿时，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老师穿越马路，幼小纯真的心灵顿时受到极大的冲击。

到了每天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班长会喊“起立！立正！敬礼！”这时候大家就会同声说：“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大家明天见！”不过比较顽皮的小朋友就会故意说成“大家明天都不见”。

小学的运动会场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开业、海山煤矿爆炸案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在 1984 年开张了。对小孩子来说，这可能比其他事情都重要。那场开张仪式办得热闹非凡，结果第一周营业额就达到 140 万元，打破了当时的全球最高纪录。“健康欢乐又明亮”的麦当劳，渐渐成为死小孩心目中的圣地，纷纷吵着父母带他们去吃。结果这一间麦当劳，在当时会有老阿公老阿妈从中南部包车北上参观，成为一个另类的观光景点。还有主妇联盟也来凑热闹抗议，说汉堡卖得太贵、垃圾食品之类的，不管怎么说，当时的那家店真是热闹非凡，风光无限。

而麦当劳的快速展店，每展一处，均带动当地的房价飙涨。当然有另一个说法是，当时台湾土地到处都在涨，麦当劳地点又选得好，所以麦当劳跟地价有种鱼帮水水帮鱼的关系。反正，短短的时间内，我家旁边的马路两边，当初的国外快餐巨头——麦当劳、肯德基、温蒂汉堡均相连而开，一场快餐业大战就活生

生地在我家附近上演。当然，那整个地段的地价都狂飙起来。

所以当初别人问我住在哪里，我总是回答“麦当劳旁边”，无形中还会有种虚荣感。

很快，小学生的休闲活动开始变成去快餐店了，这三家店也开始抢占小学的午餐市场。每天中午，麦当劳的工作人员把大批食物拿到学校传达室门口分时，总会引起很多小朋友羡慕的眼神。麦当劳在当时的价格的确也是偏贵一点儿，似乎吃麦当劳的就高人一等，是种非常享受的事。等我开始能自己打工赚钱时，可能是小时候的欲求不满，有一阵子我简直就是狂吃麦当劳的各种食品，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那一阵子吃了那么多垃圾食物，怪不得特别胖。

每次经过那条路，都会看到三家店标志性的人偶以亲切的微笑立在店门前。小朋友坐公车经过那条路时，都会大声喊：哇！麦当劳叔叔！肯德基爷爷！温蒂姐姐耶！

麦当劳叔叔的造型是他的一只手伸开，做欢迎状；肯德基老头的造型大家都知道，诡异得慈祥，呵呵地笑，手挂着拐杖；温蒂姐姐的造型是双手做向人扑来拥抱状。

有一天我很早起来上学，看到这么一幅匪夷所思的画面：麦当劳叔叔像是打了肯德基老头一巴掌，温蒂夹在中间好像在劝架似的把两人推开。不知道是哪个好事者干的。

过了几年，温蒂汉堡因代理商经营不善，黯然退出台湾市场。而在 1992 年时，就在那第一间麦当劳，发生了炸弹爆炸案，炸死一个拆弹警察，成为当年的热门新闻。

这一年年底的海山一坑煤矿灾变，也是当年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两年绝对是台湾煤矿最黑暗的两年，发生了好几次的灾变，每次都死了将近一百人。但是这些底层的工人跟小市民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何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因为有位叫周宗鲁的工人奇迹般活了下来。

周宗鲁也是个外省老兵，是个经历大小战役的幸存者。据他口述，在战争中曾经两次，全连就只有他和两三个人活下来，也算是命大的家伙。跟其他外省老兵一样，周宗鲁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就去挖煤矿。海山一坑爆炸灾变后，他被封在坑里约五天才被救出，是唯一的生还者。在那个高温 40 度的坑里，没有食物

和水分进补，他只好喝自己的尿才活下来，可说是奇迹。

他觉得是上帝救了他，所以后来当牧师去了。前几年在街上看到他在传福音发单张，没什么人理他。谁晓得他就是当年轰动全台的人物呢！到现在，每提到台湾的矿业历史，都不得不提到他。但从这几次灾变之后，台湾的矿业也没落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4）

1984 “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与“江南案”

蒋经国上台后，给人一种特别亲民的形象，常常穿着夹克便装走访“民间”，结交许多“民间友人”，给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也让许多民众对这位原来的“蒋太子”印象不错，开始对蒋家的印象改观。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民间友人”，那相对的，蒋经国应该就是在“宫廷”，高高在上的喽？那个时候，报纸就常常会看到“民间”这类字眼，可见过去

封建的思想余孽仍然占据着人们的思想阵地而不自知，简单地说，就是奴性。当局施点儿小惠就叫“德政”，其实，这些还不都是当局本来就应该做的吗？

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位的这几年，民众对当局在情感上有那么一些稍微改观。但是这年发生的“江南案”，又让大家彻底失望了一次。

2007.11 月 8 日台湾竹联帮前帮主举行出殡仪式五千
黑衣

江南本名刘宜良，是台湾报社的驻美特派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其实他也负有收集情报的特工身份。江南在美国期间写了《蒋经国传》，并于美国报上连载。这本传记，详细地记载了蒋家内部许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权斗争历史。当时，当局认为他是为污蔑蒋家而心生不满。

因此，由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锄奸”，在旧金山暗杀了江南。

结果这件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加上聪明的陈启礼已经先行录了一卷自保录音带给别人保管，因此马上

被查出来跟台湾当局有关。美国政府大怒，因为，台湾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了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江南。但又有一说，江南原来也是 FBI 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当然，当事人后来都作鸟兽散，四处逃亡，陈启礼也逃回台湾。这件事除了让民众对当局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外，也让民众深深感到黑社会之恐怖——当局原来与黑社会有这样的挂钩！

蒋经国到底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执行策划者是他的儿子蒋孝武。后者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成为接班人的，后来虽然他没事，但也从此被外放到岛外冷冻着。

后来当局为了转移话题，拾回形象，在当年年底也展开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许多大哥不管有事没事通通落网。在过去，“绿岛”本来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大哥的故乡”，号称“绿岛大学”——要成为大哥，都要先去那里“进修”一下。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电视上总是有扫黑的宣导短片，一堆明星穿着警察的制服，拿着扫把在扫着地上一堆堆黑黑的纸屑，在“扫黑”。

几十年后，电视再访问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还是认为那时所做的是为了台湾为了当局，一点儿错也没有。看看台湾后来的社会发展，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觉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只是他们认同的对象错了而已。那几年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5）

1984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综艺节目

台湾的娱乐工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了个爆发式的成长。可以说，大家有了钱，就开始爱听靡靡之音。

电视台三台都有许多的综艺节目出现，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天晚上，是综艺节目的主战场。当时的许多主持人或跑龙套的，现在都已经是综艺界的大佬。不过当时的综艺节目，在一阵欢乐过后，主持人及来宾们一定都会合唱几首“净化歌曲”——不外就是那些“观念正确、意识健康”，鼓吹乐观向上人生观的歌曲，就是怕大家听太多靡靡之音导致风气败坏。于是每当节目结束前，我们就会看到所有参与这次节目的艺人

排排站，在各无线电视台大乐队的伴奏下，一起双手打拍子，随着伴奏摇摆，一起高声齐唱“净化歌曲”。间奏时，主持人还会顺便感谢一下所有来宾，以及由×××指挥所领导的×视大乐队。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印象最深刻的 80 年代初的综艺节目，一定是张小燕在华视主持的“综艺一百”。那时候，美国电影《第三类接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五个音符。因此，张小燕也打扮成科幻状，化名“易百拉”来主持其中一个单元，口号就是“达啦哩达啦”那五个音符。

“综艺一百”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娱乐新闻”。其中有个单元叫做“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以全台湾各地唱片行的专辑唱片销售量为依据统计，于每周日的节目中发表排行概况，并在隔天的星期一，在《民生报》刊登榜单及介绍。这是台湾第一个流行歌曲的排行榜，每个礼拜天，牵动着万千歌迷的心。

华视的“综艺王国”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下来的，尤其是星期天晚上的节目，都是倾电视台之力打造的。另一个节目是凤飞飞主持的中视的“一道彩虹”。凤飞飞在当时是台湾的平民天后，亲和力又够强，受到

基层百姓的喜欢，她的许多歌曲如《飞上彩虹》、《掌声响起》、《祝你幸福》，到现在大家都还能朗朗上口。

等到凤飞飞离开台湾后，接替她的节目就是“黄金拍档”。这是台湾第一个大型综艺节目，每个礼拜录制节目都把整个艺文表演会馆包下来，让千余名观众进场观看现场节目。这个节目大受欢迎，几位主持人张菲、倪敏然、检场、罗江、徐枫，合称“黄金五宝”。其实这个节目有点儿模仿当时日本的“志村加藤大爆笑”、“八点，全员集合”等节目，但这也是后来看到“志村加藤大爆笑”的录像带才知道的。

这个节目编排大概也就是一堆戏谑的短剧、唱歌、观众游戏等，但都因为没有剧本及固定台词，一切都是靠五位主持人及特别来宾的临场发挥，所以也出现了不少超爆笑的突发状况。

因为舞台大，所以一切看起来都超豪华。他们也曾经把军舰或者 747 客机的机翼当做舞台来表演，在当时的综艺节目来说，简直就是超大手笔。

“黄金拍档”不仅捧红了张菲、倪敏然等人，也捧红了短剧里的几个人，如张菲演的“董娘”、倪敏然演的“七先生”等。还有比如互砸蛋糕面粉等桥段也是

那时开始的。每次的短剧一播出，有什么新的花招，到了礼拜一，一定都是小朋友们模仿的项目，比如说那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夸张地笑倒在地，就是从“黄金拍档”里学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想去参加“黄金拍档”的现场录制，如果谁去了，别人一定羡慕得半死。当时当局也很喜欢办一些大型的综艺晚会，不过都带有些政治目的。比如一些名目如“三民主义”艺演晚会、“团结自强”晚会、“双十”晚会等，而且一定会三台联播，比如说每年“双十节”晚上一定都是“四海同心”晚会。一开头不免就是蛙兵表演蛙操、仪仗队来表演个操枪分列式，然后歌星唱唱歌。每年必唱的是“净化歌曲”，而舞台背后一定都动员学生，将练了很久的排字秀展现出来。其实这些内容都大同小异，不过在那只有三台节目的时代，大家也都喜欢看。综艺大姐张小燕，至今活跃舞台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6）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流行音乐界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台湾流行歌坛刚脱离民歌的年代，但又受到“民歌世纪”的影响，所以多少还是有点儿清新的感觉。而且，那是一个“玉女”当道的时代。

林慧萍、金瑞瑶及杨林等人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玉女们总是以清纯的形象出现，有一点儿楚楚可怜的样子，但多是“东洋风”。许多玉女偶像都参考日本的歌手来定位，如当时的金瑞瑶，以一曲翻唱自日本歌曲的《飞向你飞向我》迅速走红，搭配歌曲的手势与迷人的长腿，风靡于青少年间。而有点儿走忧郁路线的林慧萍，很明显的就是模仿中森明菜。至于杨林呢，以一首《玻璃心》而大红，她的标准动作就是左手握拳，轻拍着脸嘟嘴微笑。那时候的少女们，都疯狂地学着这样笑，硬是把前两位挤了下来。现在看来，当今“90 后”们自拍时的“招牌”动作，早在 30 年前就流行过了。

而转入幕后，刘文正组“飞鹰唱片”，推出了伊能静、方文琳、裘海正三位新人组成“飞鹰三姐妹”：日本漫画美少女般的伊能静，气质路线的方文琳，运动健美型的裘海正。后来，方文琳紧追在杨林后面抢夺玉女宝座。这些玉女歌手们，大多数是受到男性歌

迷的喜欢，以现在的术语来说，都是走“疗伤系”的路线。在摩托车众多的台湾，当时要看够不够红，其实就是观察照片有没有登上摩托车的挡泥板。当时，方文琳、林慧萍、杨林并列为摩托车后挡泥板最热门的三大玉女偶像。

当然，那个时候在歌坛，罗大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他当时一身离经叛道的造型，加上又是那么才华洋溢，尤其《恋曲 1980》和《童年》等歌，无论是词曲还是演唱方式，都跟以往的音乐有着耳目一新的不同。接下来，他又推出《之乎者也》与《鹿港小镇》等更含深层意义的歌曲，虽然有抗议精神，却也引起更多年轻人共鸣，马上造成极大轰动。而费玉清当时也越来越受欢迎。早期国语歌分为两大主流，一个是有官定意识的“净化歌曲”，另一个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早期费玉清就属于前者，到后来才开始唱些民谣小调的。另外，充满了书生忧郁气息的姜育恒也是这个时候出道的。

而对小朋友来说，以上几位影响都不大。一方面歌词太深，是“大哥哥大姐姐”们喜欢的；另一方面，唱的歌又太古板，妈妈应该会喜欢。对小孩子来说，歌词和音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歌手够不够吸引人，

特不特别。所以，当初的“蚱蜢王子”李恕权那动来动去好像跳个不停、随性不羁的演唱风格，真的是抓住了大家的目光。

李恕权的成名是突如其来。在某一天，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李恕权，首张专辑《回》静悄悄地上各唱片行的版面，只不过三个星期的光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综艺一百”国语流行畅销榜的亚军位置，硬是把当时正红的林慧萍、郑怡等歌手挤了下去。李恕权也真的是个人才，在 NASA 当工程师当烦了就改行玩音乐，居然在美国也能拿了个“格莱美奖新人奖”入围。李恕权回到台湾后，他那种美式的表演风格及曲风——夸张的奇装异服，动感的跳舞风格简直让青少年们为之疯狂而争相模仿，因此横扫了当时的排行榜。

另外还有齐秦、薛岳等人也是同时期出道的，因为那时候的印象不深，在此就不提了。

女艺人方面，1983 年的电影《搭错车》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大家都会唱上一两句苏芮的“酒干啊倘卖无，酒干啊倘卖无……”不过小朋友们也仅仅只会唱这一句而已。另外一个对小朋友影响比较大的女歌手应该是“娃娃”金智娟，她那时候还在“丘丘合唱团”里。

大家也都会唱那一句“就在今夜……就在今夜！”（越唱越高亢状），不过唱到后面基本上也都开始胡乱唱了。

而同时，最红的西洋歌曲可能就是《WEARETHEWORLD》。同样，每天下午扫地时常放这首歌，小朋友们也是只会唱这一句而已。到了1985年，台湾的众唱片公司及歌星，也来了一次大联合的“群星为公益而唱（BandAid）”，由罗大佑等人作词，写出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不过后来这首歌被国民党拿去当竞选主题曲，气得罗大佑不想回台湾。

当年的玉女代表金瑞瑶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7]

1984 20世纪80年代初小学生喜欢的电影明星

20世纪80年代初，有四位电影演员不只是小朋友喜欢，而且应该算是当时在影坛上最火爆的电影明星了，尤其是电视节目贫乏、电影有更多声光效果的年代。

台湾电影市场简直就是整个蓬勃起来，主要是以娱乐片为主。

这四个人分别是陶大伟、孙越、方正、许不了。在大家的印象里，前两个人是一组的，后两个人是一组的，但是他们四个人也一起拍了好几部喜剧片。再加上当时这几部戏像林青霞、张菲、胡瓜、张小燕等人都有参与演出，可说是大牌云集。

许不了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的喜剧泰斗，他的出身非常草根，一步步刻苦努力爬上来的，因为扎实的演艺训练，说学逗唱样样都会。那时候台湾流行“秀场”，即一边吃饭喝茶一边看艺人表演的地方。其他大牌艺人可能都要唱歌跳舞加上乐队才能撑完全场，但许不了光凭说笑话就能撑完全场。他的形象非常滑稽，电影《小丑》的形象深植在当时台湾人的心里，这部笑中带泪的电影可说是他的代表作。现在回头来看这部影片，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喜剧天才，周星驰可能还差他远了。他的人生也跟小丑一样，在人前尽量表现欢乐给大家看，但背后有各种如工作、黑道等的压力，只能借酒消愁。那几年他每年至少都有九部以上的电影，可见压力之大。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得

了肝硬化，最后酒精中毒而死，只有 34 岁。让人不胜欷歔，也结束了那几年的“许不了时代”。

方正跟许不了是同期的人物，当初大家都叫他“大馒头”，他跟许不了的配合默契简直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但他在许不了过世后，也慢慢淡出影坛，后来做生意不太顺利，近几年出现在台湾是 2005 年的倪敏然过世的场合上，听说他现在在美国当牧师了。孙越和陶大伟这对活宝兄弟，对那时的小朋友影响更大。

孙越也是个外省老兵，加入军队里的话剧队后正式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在早期的台湾电影里，他都是以大反派的角色出现，后来参与电视演出后，开始转型为谐星路线。1981 年他跟陶大伟合作的《朋友歌》，可是当时大家都会唱的歌，后来一直到我上了中学为止，办什么活动都一定会放这首歌，影响很大。

他后来受陶大伟影响，也接受了基督教。1983 年的《搭错车》是他演艺生涯的巅峰，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部片很多都是在讨论当时台北的眷村改造以及老兵的问题，但剧情很感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自此之后，孙越开始献身公益活动，现在在

台湾虽然已经息影，但形象仍然十分良好正面，大家都叫他“孙叔叔”。

陶大伟就是陶喆的爸爸，在当时他是个绝无仅有全能型的天才艺人，不管是词曲创作、画图、演戏等才艺都全包了，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艺人之一。他那个娃娃脸，其实大家看了都会觉得轻松。在他的电影或音乐作品里，总是诙谐逗趣，又有点儿童心未泯，很多都是小人物为主角，鼓吹着一种乐天、知足、存善的励志人生观。所以，民众对他的印象总是轻松、欢乐、有朝气。

当时的小朋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陶大伟，都叫他“陶叔叔”。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演艺生涯达到最高峰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去做儿童节目，并担任主持人。那个节目叫“嘎嘎呜啦啦”。节目里陶大伟用孙越的形象做了一个小布偶叫“孙小毛”，跟他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大受小朋友欢迎，可说是影响了台湾所有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段出生的小朋友，家长也鼓励小朋友看。所以说，在这四个人里面，陶大伟对我们这群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是最大的。

说到这四个人的合作，就不得不提到朱延平这位导演。他在台湾是专拍商业喜剧片的，近几年的作品，可说

是毁誉参半，2008 年的《功夫灌篮》就是他的作品。现在回头看他几十年前拍的那些，会发现以前拍的水准怎么那么高，现在就拍成这样子了啊！

此外，1984 年，香港导演麦当雄的电影《省港旗兵》也在台湾上映，是妈妈带我去看的。现在想起来，妈妈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才带我去看的。片子里大圈仔的凶狠让我看得呆掉了，在滑冰场的那场枪战戏到现在一直忘不了。最后一幕，警察朝着阁楼扫射，全部死光光的画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痛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觉得香港的治安很差，就是看了这部片的原因。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8]

1985 十信案

我家的电话号码很好记，选得很好。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总是在特定日子里有人打电话来骚扰，后来也习惯了。这一件小事，让我家与“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十信案”为台湾史上最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汇外，已经有点儿类似银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控制的。在 1960 年，蔡万春因需大量资金投资土地，想从十信调集资金，故在十信发起“一元开户”的方案，使得短短时间内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亿元，成为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湾人，习惯把赚的钱通通藏在家里。改变这个观念的重大原因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灾”，这次台风造成的水灾使得中部灾情惨重，到现在为止，都还算台湾史上最严重的水灾。这次水灾，使藏钱在家里的百姓损失惨重，因此有了将钱存在金融机构的观念。相较于银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续简单的信用合作社就成为一般民众存钱的首选。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蔡万春的儿子蔡辰州当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大家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总要打通许多关节，所以其中的内幕可想而知了。但后来，当局开始发现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库存现金偏低的现象，经过多次警告，仍无

改善。一直到后来，放款总额已经超过存款总额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崩溃。

“十信案”的爆发，严重伤害了台湾投资人的信心，弊案金额超过一百亿元，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也血本无归。这件事也导致一堆大小官员辞职或下台，牵扯到的人数达到两百多人，最高的已经涉及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彥士。蔡辰州本人被捕后，在判刑前夕也挂掉了。

“十信案”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民党与财政金融间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蒋经国非常之震怒，在过去党政不分时代，蒋经国下属的应该有三个秘书长：“总统府”，“中央党部”，“国安会”。本来蒋经国都很放心将事情交给他们做的，“十信案”以后，蒋经国开始变得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

有人说，“陈文成案”、“江南案”让蒋经国看清了情治单位的摆烂以及流氓心态，那么，“十信案”让蒋经国看到的就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腐败的真相。

蒋经国决定重振党风，革新体制，组成严家淦领导的十二人小组研讨政治革新问题，这十二人小组的成员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蒋经国也借此机

会安排李登辉和其他大佬们互动，在很多决策上，他会当面指示李登辉，以便于李在十二人会议上发挥影响力。而严家淦中风后，李登辉也就顺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李登辉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又更上了一层楼。

至于我家的电话，当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关系人买来的，而这个家伙在“十信案”后就被暗杀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干掉那几天，总是有骚扰电话打来，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原台北十信总社，现为合作金库城内分行

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离“解严”就只剩几年了，一切都已蓄势待发，就等冲破的那一刻。党外人士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虽然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物大部分都还在牢里，但年轻一代的人已经纷纷投入这波浪潮之中。而蒋经国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蒋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来国民党的政权不可能重返大陆，所以必须为国民党在台长久执政埋下基础。打根基的步骤有二，其一为改

造党的体制，其二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国民党青壮的第三代，以本土化与反对分子对抗。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青壮一代都陆续在这几年出头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陈水扁和谢长廷，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后，同时都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并且都是在同一选区。往后十几年，从市议员一直到“立法委员”，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号称全台第一战区的台北市第一选区竞选，每次两人也都高票当选。也许第一选区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两位“巨星”，所以才特别令人瞩目。

我家刚好就是在第一选区，旁边有间小学的操场及广场，常常都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地方。从小，我就见识到这两人十几年来亦敌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说也奇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很少办政见发表会，看到的都是党外候选人，而党外候选人的场子永远都比国民党的热闹，也许是国民党人都已经习惯那种笃定当选的情况了，所以不太积极。常常都是晚饭吃饱后，全家扶老携幼，到政见会场去听演讲，吃着民主香肠，逛逛小书摊。大人们都在前面听，小朋友就在后面玩

起来了，那种感觉反而让人不觉得有什么政治气氛，像是种家常便饭后的娱乐活动一样。

虽然陈水扁当选了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到了 1985 年，陈水扁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故乡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他老婆吴淑珍在后来陪同谢票行程中，遭到车祸，并导致终身残废，到现在，这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一直都说不清。但也因为这一件事，陈水扁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1986 年，陈水扁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社因报道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冯沪祥论文抄袭他人著作，而被判刑一年。这件事有很明显的政治力介入，为“蓬莱岛案”。同一年，吴淑珍代夫出征当选“立法委员”。后来陈水扁出狱担任她的助理，可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陈水扁在出主意的，所以那时陈水扁有个绰号叫“影子立委”。

谢长廷的从政历程跟陈水扁差不多，不过那几年他都在台北市担任市议员。跟陈水扁大刀阔斧的形象不同，谢长廷一直都给人细腻的形象，就是那种会把法案及弊案慢慢地、细细地一点一点切开，再慢慢地一点一点推翻的那种个性，一直就是给人细心又机智的形象。

所以那几年总有人说，陈水扁是把关刀，揭弊时一刀让人毙命；谢长廷是把沙西米刀，可以慢慢解剖敌人。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辈、同期，又在同一个选区出身的，要叫谁服谁，都不会服气，但在后来为了大局，也常常会有自我牺牲的情况出现。

至于那时候刚开始崛起的国民党新生代人物，大部分都是循“党国体制”下的官僚升迁管道在进行，也就是可能在当局部门里担任过职务后，又在党里担任一些职务，但大部分都是政务及党主席同时担任的。如马英九，他在留学回台后，因为家世清白，又是“忠党爱国”世家，因此被推选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当时小马哥可真是年轻帅气啊！每次蒋经国接见外宾，就见到马英九坐在中间翻译，新闻一放出来，不知道当时让多少女人为之注目。这几年间，马英九也担任国民党内的第三副秘书长。国民党设有好几个副秘书长，各有不同的职务，而马英九担任的这个第三副秘书长，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大陆的。接下来，他也通过了进入官僚系统的甲等特考，正式开始官员的生涯。

宋楚瑜的经历也是差不多，但他比马英九早了一个梯队。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国外留学回来时，蒋经

国还在担任“行政院长”。他也是经过推荐担任蒋的英文秘书，后来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政治红人的。后来他担任新闻局局长，尤其在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时，他在记者会上宣布当局立场的“正气凛然”之貌，一夕之间吸引了不少女性 Fans。到了 1984 年，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副秘书长，当时算是小马哥的老板。他们两位在二十几年前都非常帅气，又在党内有非常光明的前途，谁都知道他们以后的仕途是一片大好。至于连战，他的经历也跟上述两位差不多。但当时他实在太过低调，大家也没什么拿来好说的了，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而已。

在这里，我无意把现在所有在台面上的人物拿出来点评一番。不过，这二十年来党里派系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亦敌亦友实在太过精彩，可说是直追《三国演义》，只不过武器从刀剑变成言语及宣传策略，攻略从土地变成人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些资料，我在这里说的只不过是其所看到的侧面，一家之言而已。

马英九（中间位置）当年做翻译时的照片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

1985 第四台

早期台湾无线电视台只有三台而已，三台编排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早上，开始晨间的新闻节目。后来有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小朋友早起，早上起床时间也放些卡通影片。

到了中午，会有些小型综艺节目和新闻。一般说来，中午新闻都是闽南语的，待播完后，电视节目就停止了，到了下午四点才又开始播。下午四点后可能就是些主妇节目或卡通影片（因为小朋友都下课了）；晚上七点则是新闻节目；新闻后是连续剧，从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段”，八点播出的连续剧则称为“八点档”；十点后则播一些音乐节目，比起现在，算是很早就收播了。

前面说过，三台分属于党（中视）、政（台视）、军（华视），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某些特殊时刻也会进行联播。在我们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双十节”三台主播十几个人坐成好几排，

轮流播报新闻的盛况。当然，在早期只有三台，并且新闻只有早、中、晚各报一次的时代下，新闻中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一幅国泰民安、公平正义的美丽画卷。但三台节目大同小异，又大多陈腔滥调，民众看了也无聊。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有些商人开始自行在大街小巷间拉有线电视线，播放一些不具版权的录像带节目，这样，频道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当时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警察不定期都要来拆线一次。民众称这些节目为“第四台”，其实就是有线电视节目。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邻近国家（尤其日本）的卫星节目，还有一些电影的录像带、股市信息、摔角①等，甚至还有色情节目，反正影像品质普遍都不怎么好。后来有一段时间，第四台为了顺应民意，还会放一些候选人的政见发表、“立法院”的开会过程、街头运动实况等。

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公的故事”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 80 年代初纷纷进入小学的。小学共分低、中、高三个年级，又各有两个年级。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觉得五六年级好

大呀，心中充满了敬畏感以及期待感。但现在来看，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六年级，还不都是死小孩！

台湾小学教育的课程，以传统又官方的说法，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因此，当时的课程设计，一学年分上、下两学期，除了主科——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生活与伦理以外，还有体育、唱游、美劳、书法、珠算等课程，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时代性的“保密防谍”教材。

我想大陆的朋友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年代台湾小朋友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过去当局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在教材里灌输给我们，所以就简单说一下吧！这些观念主要是在国语、社会、生活伦理以及保密防谍课程里出现。

台湾国语课本中描写蒋介石小时候，看见小鱼逆流而上而感动的故事

在国语课本里，每一课都有些小文章，下面会有几个生字让大家练习。可能那一代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蒋介石看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了：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

（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是很典型的关于蒋介石的小故事。而政治教育也体现在儿歌里，以前有首大家都会唱的儿歌叫《哥哥爸爸真伟大》，是这样写的：

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
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首儿歌还有后面三段，一段比一段激昂，一段比一段杀红了眼。到了最后一段已经是：

革命军人真伟大，四海把名夸，
拼命去杀敌，牺牲为国家，
杀吧杀吧革命军呀，我也要把奸匪杀，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很儿童不宜吧！可能当时的教育工作者都还有点儿默契，觉得这最后一段儿童太难理解，索性不教了。

抗日歌曲的歌词也是课本里面的内容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旗正飘飘》。而且，这一定是老师指定要背并默写的课文之一，到现在我都还会背。“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我上到五六年级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开放，这些课程也慢慢地消失了。

至于生活与伦理，按照出版纲要，即介绍给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时，课本总是强调蒋介石如何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教导小朋友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蒋介石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命。不知道听过多少老师陶醉地说，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所以蒋介石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中山先生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道统，尤有甚者，一激动把蒋经国也给加进去了。

而保防教育，光是看名称就知道是什么内容，就一本小书，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诱惑、食物诱惑或金钱诱惑就出卖了机密和情报等。小朋友哪懂得那么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谍的演讲比赛上，最后总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谍（音拉长），就在你身边（加重语气）”，然后再重复一次。社会课主要就是介绍简单的社群及社会观念，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形态。到高一点儿的年级，就开始上些简略的历史及地理课程，以及台湾发展、社会现状的介绍，里面一切有关台湾社会的内容都是那么和谐美好、欣欣向荣。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

1985 小学的一天

我以前读小学时，早上七点半前要到校。不过可能是住得离学校太近，过于松懈，所以还是几乎天天迟到。一迟到，校门口就会有許多纠察队在登记班级名字，并报告老师，有时候还会罚站，再统一带回教室。早上到学校后就开始早自习，然后会分派打扫任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扫地区域。另外学校外围环境也要出去打扫，只不过常常会顺便出去买零食。早上时间会有校内广播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录制的，每天会有不同主题。有时候居然还会有“访问台北市长”这种节目出现，不过这个“市长”也是小学生自己充当，所以也常常出现许多小学生一相情愿的问题及答案。

八点左右要升旗，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几乎是天天要到操场升旗，不过到了六年级后，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场前，各班都会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队，然后音乐声响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楼，向操场方向前进。当时的台湾小学，以我在的都市区小学来说，一班几乎都是五十几个人，一学年约有十二三个班。所以学校操场比起大陆的小学，都大很多，足够容纳学校近四千个人聚集。

各班都走到定点后，台上的司仪就会统一喊整队口令，待整完队后就开始升旗。这时，乐队又开始演奏音乐，四个小朋友各拿着旗子的一角高高举起进场，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会先唱歌，待唱完后，旗帜才会随着歌声缓缓升起。

升完旗就由校长、各室主任等人轮流上台讲话，不过基本上小朋友不太会听，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会完后全校就会来一段“国民健康操”，台上总是有几个同学在带领做动作，小学时有被选上去做过一次，真是超丢脸的。每周一天是周会，就会请外面的讲员或表演团体来校。周会比较讲究，还要先读“国父遗嘱”及敬三鞠躬礼。不过周会时不用上课，坐在操场上就好了，台上讲得口沫横飞，下面聊得也不亦乐乎。

小学大概的课程前面有讲过了，另外就是体育、美劳、唱游等课。台湾的小学生，在体育课时最喜欢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简单来说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内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场到外圈去。这样，外圈的人越来越多，内圈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目标。后来几年，日本以躲避球为主的卡通《斗球儿弹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时，当球一丢出去，总要喊些什么力量球（或焰之球、龙卷旋风球、闪电球……）之类的，球上也被画一些火焰之类的，然后学一些卡通里华丽的投球动作（虽然说那样在力学上根本使不上力），结果乱投还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学生。除了躲避球外，体育课比较特别的还有教扯铃，但是我只会让它转动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学做出一堆超华丽的动作，都会很羡慕。动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蚂蚁上树、巴黎铁塔什么的，并且每次都会看到有人在比赛抛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试着抛高，掉下来打到了头，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

台湾小学里的躲避球运动

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

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

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

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

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

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

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

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 15 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

台湾小学的“自治市长”政见发表会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1]

1986 社运的启蒙

1986 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都精彩无比。小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美国那橘色火箭的“挑战者号”，在现场播报者兴奋的语气中升空，一分钟后整个爆炸。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傻掉了。当年，说未来要做航天员的小朋友少了很多。

二月时，科拉蓉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长期高压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流亡到美国。这件事给国民党很大的震撼，也给党外很大的鼓舞。

除了政治事件外，1986 年的两起民间发起的事件，也对台湾民间的少数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并冲击了民众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反杜邦运动及汤英伸案。

在台湾的历史上，除了这几百年移居过来的人之外，还有原来就住在台湾本地的少数民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叫做“山地同胞”，简称“山胞”。

长期以来，当局对他们疏于照顾，导致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极度匮乏，而“山胞”在台湾所占人数也很少，算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年轻气盛就走进社会。由于没有文凭，他们能够选择的便是粗重的工作：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等。而女人，也常常沦为娼妓、雏妓。后来那几年，雏妓问题也一直成为社会运动关心的对象。

汤英伸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汤英伸本来是师范专校学生，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而来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找到工作九天之后就杀了雇主全家，最后虽然主动投案，但他仍被判了死刑。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汤英伸。

原来，汤英伸来到台北后，被介绍所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当杂工，老板以先代付高额介绍费为由，强行扣留他的身份证。汤英伸就这样待在这个既闷且热，每天需被强制工作 18 小时以上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他忍受没几天就想要离开，老板夫妇非但不准，还拿出手中那张汤英伸身份证，扬言说他欠钱未还，并加以辱骂。

就在这其中发生了口角，再加上一点酒精的催化，汤英伸终于酿下大错。

图为汤英伸的妹妹抱这汤英伸的骨灰。《人间》杂志是台湾过去较重人文及社会关怀的杂志

汤英伸的经历是当时山胞们找工作时常遇到的事，一般雇主认为他们好欺负，歧视他们，所以汤英伸事件算是一个引爆点。这样一个没有前科，在校时表现良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救援行动，不管是党外、社运界，还是宗教界都活动了起来。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检讨的，是整个畸形扭曲的社会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漠视与歧视，以及有形无形的莫须有排斥，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等。

后来汤英伸还是死了，但从这件事以后，社会开始关注山胞问题：社会是否给他们公平的对待，是否一直对他们有种有色眼光，是否尊重过他们的实际需要与诉求。

此外，这年的“反杜邦”也是环保运动的一个启蒙。大凡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相冲突。支持经济发展优先的人，认为人民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可以牺牲一些环境。而环保人士认为，环境一旦破坏，以后花再多的金钱也挽救不了。这种问题在传统思维上常常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争论不休。

台湾第一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即反杜邦案。大家都知道杜邦是国际性的化工大厂，当初他们决定在鹿港（就是罗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镇》里的那个鹿港）附近的工业区设立化工厂，但因生产品为高污染性的化学品项，故引起当地居民的群起抗议。后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时还在戒严的情况下，抗议人士向当局进行强力抗争，用各种手段抵制杜邦设厂，为台湾史上第一次。

后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于鹿港设厂计划，这也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当然，若以上面那种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到现在还很难说，当初杜邦中止投资及后续影响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但这件事代表了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这件事以后，释放了各种相关的工运、学运、媒体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强大能量。

来年的 1987 年，当局就成立环保署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2]

1986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太，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 9 月 28 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

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吓惊关，吓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 20% 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民进党组党”后第一次参加立法委员选举，就得到很好的成绩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3]

1986 圆山动物园搬家

圆山动物园是很多台北市民的美好回忆。在市区的圆山动物园，及旁边靠近基隆河的儿童乐园，是许多市民假日会去的地方。园区门口有好多卖茶叶蛋、烧酒螺、渍芭乐的小贩，逛完动物园也可以顺便在旁边市政广播电台地下室吃小吃。小时候要到动物园，简直就跟要去朝圣般期待。

在动物园里，大象林旺永远是最有名的动物明星，可能也是动物园里最老的动物，它的栅栏前，总是围着一群小孩子在大叫。每年的林旺生日，动物园还会准备一个大大的蛋糕请它吃，它也总是很识相地伸出长长的鼻子来把蛋糕卷走。因为大象林旺太有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以为，动物园里的大象只有林旺跟它的老婆马兰而已。

这只象也真的是长寿，总共活了 86 年，从西南的滇缅公路，又到湖南、广东，最后来到台湾，伴随着许多台湾人成长，跨越了好几个时代，已经变成台湾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

目前动物园中大象林旺的标本

当时的圆山动物园是以栏杆来圈养动物的，每个动物分的场地不大，动物躺在里面都懒洋洋的，任凭小朋友们喊叫逗弄，它就是给你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除了林旺之外，猴岛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地方，没有栏杆，猴子都在岛上欢乐地玩着。小朋友总是喜欢拿东西砸猴王，但每次都被它灵巧地闪过，它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愚蠢的人类”一样，有时候还会见它的“护驾”把东西丢回来。有一次，猴岛上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只狗，只见那只狗一直被猴子戏弄，一副无辜的样子。圆山动物园实在太小了，给动物的空间不够，终于要在这一年搬到郊外的木栅去，在那里，一整片山头都是动物园的场地。于是，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通通进了特制的货柜，上了车，整个车队由花车前导，浩浩荡荡地经过大半个台北市。那可是当年的大事啊，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许多老师也带学生在一旁排队表演，万人空巷。

那时候滚石唱片还特地为这次搬家作了一首歌，叫《快乐天堂》，由滚石众群星合唱，第一句的“大象的鼻子正昂扬……”就是指林旺。

后来到了木栅，那里场地就大了，占了整片山头，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个下午，号称全亚洲最大。圈养动物

处也变为开放式的空间，有好几个主题的大型馆区，游客可以走在步道上穿越蝴蝶及鸟类的乐园。非洲狮的家更大了，可它们还是懒洋洋的。林旺也有了更多空间散步。这几年的无尾熊（考拉）、国王企鹅等明星动物，也都曾引发一阵热潮。但林旺死后，还是留给大家一阵空虚，听到这则新闻，我才又想到那个在我面前表演的老朋友。动物园现在好像没一个标志性的动物，所以有些人也开始期待熊猫了。

圆山动物园搬家的场景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4]

1987 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 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

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开放大陆探亲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

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共产党给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

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

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当时的电视台或者报纸、杂志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

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当时来大陆的台湾人用的不台胞证，而是这样的旅行证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5]

1987 大度路飙车风

“飙车”一词大概就是 1986 年、1987 年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汇。那一阵子，台北市的近郊新开了一条快速道路“大度路”，长约四公里，又宽又直。刚开好那

段时间没什么车，大家都习惯将车开得很快，享受那兜风的快感。

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年轻人聚集在这里骑车追快。本来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已，但经过媒体报道后，突然之间大批人和摩托车拥到这里来看飙车或参加比赛，最多时达到上千人。半夜的郊外路上突然热闹非凡，也聚集了许多卖香肠小吃的小贩，如同一个夜市一样。

青少年的心态就是这样，受到人注目或鼓励时，心里会 HIGH，因此，每天晚上都有上百辆摩托车在这里比赛。当时刚推出 50cc 的速克达摩托车，这种摩托车轻巧方便，俗称“小绵羊”，但也因为太小了，所以骑士只要脚长一点儿就必须把脚分得很开才能骑，如果人再胖一点儿，那个画面看起来简直就是人比车子还大，极不协调。但因为这种车轻巧又便宜，且方便改造，遂成为许多青少年，尤其是无照驾车青少年的最爱。当然，50cc 是入门级的，许多人骑的还是“名流 100”，改过的伟士牌或 RT、RZ 这些车。

当时青少年喜欢将车改装，车斜板上自以为浪漫地贴满了“梦中人”、“追梦人”、“缘”等字样，斜板内侧装着的两个大高音喇叭放着音乐，还指定要有连

续音效果的，大部分放的是那时候少男偶像杨林的歌（你可以想象，就跟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拿着山寨机大声放“那一夜”一样）；坐垫后面一定还要插一根天线，天线上可能还装一些亮圈，减震器加长让屁股翘得很高，排气管声音像放连环屁，改后的异型，有种俗艳美。但有些人没车，只好偷骑着妈妈买菜的车来飙，所以车前面都还有个菜篮。现在看来这些改装简直蠢毙了，但当时就觉得这样做很帅，不知道这些人回想当年那些装饰，会不会羞得无地自容。

比赛的方式很多，大部分还是竞速，但在竞速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奇怪的坐姿：跷脚，坐在脚踏板等智障骑法。比较特别的还是这些人喜欢载着女朋友一起飙，可能越飙越快，女朋友就会越抱越紧，荷尔蒙及肾上腺同时亢奋，达到极乐的快感。此外，这些车飙的时候一定让脚架跟柏油地摩擦产生火花，如此，在夜色中会看到一条火花急速飞奔，大概这样会产生梦中人的幻觉吧！

在大度路飙车的全盛时期，全台湾的英雄好汉都组队到这里参加飙车，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影响了正常的行车，甚至发生斗殴烧车等事件。后来警方调来一个分局的警力全力扫荡，终于把这股风潮平息下去。

当然，大度路夜市也瓦解了，但从此之后，飙车的风气开始向全台蔓延。

好一阵子，台湾在办青少年活动时一定有“反毒”、“反飙车”之类的口号。

传说中满大街乱跑的名流 100

电影《报告班长》轰动全台

在过去台湾电影的题材里，有一部分是“军教片”，即军事教育题材的片子。这一年，电影《报告班长》上映，造成大轰动。这部电影到现在还一直在有线电视频道上播出，因为太过经典，其中有一些句子变成日常生活的惯用语，也有些桥段成为后来不断被模仿的对象。

这部电影后来拍成一个系列，但还是以第一二集最让大家印象深刻且津津乐道。第一集描述的是新兵中心的生活。众所周知，台湾的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去服兵役，在真正分发到一般部队之前都要在新兵中心待一段日子，从“死老百姓”训练成为一个具有基本步枪兵资格的军人。在新兵中心里，菜鸟新兵接触最

多的长官就是班长。在《报告班长》里，庹宗华饰演的外表坚毅严格但私底下关心新兵的班长，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形象，以至于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庹宗华一直都只能饰演班长，永远都升不了官。还有柯俊雄饰演的连长，也因为形象过于正气，在后来一直都饰演基层军官“永远的连长”。

这部片的经典桥段是，新兵在聊天时不知道班长就在旁边而乱说话，后来班长在列队时抓出这几个新兵来，要他们大声说一遍之前说过的——

新兵 A：“听说班长很凶！”

新兵 B：“对啊！”

新兵 C：“班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小学也当过班长！”

新兵 B：“对啊！”

班长：“再大声一点！”

新兵 A：“听说班长很凶！”

新兵 B：“对啊！”

新兵 C：“班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小学也当过班长！”

新兵 B：“对啊！”

班长：“给我重复五十遍！”

这是我们这代人一定都知道的电影台词之一。

许多尚未服兵役的年轻人也是经过这部电影对军中生活产生第一印象的，到现在都是如此。当兵时会遇到的情况，如打混摸鱼、装死、参加演习、兵变（当兵时女朋友变心）等都出现在电影里面。当然，还没当兵的人会觉得军队里的生活真是严格。不过，以前我的老师看了这部片以后却有点儿不屑，说：“我以前当兵时当班长绝对比电影里严格一百倍。”本来就是嘛！当完兵的人都会觉得后来去当兵的人过得太爽。这部片子上映之后，带动了台湾拍军教片的风潮，一系列的片子跟进。军教片其实不一定都那么强调军人的正面形象。大概是台湾兵力大部分都是由义务役组成，所以在这些片子里，很大部分常常都是描述些军旅生活的小细节：当兵时的打混摸鱼以及劣根性。可能也是因为这部分较具趣味性。当然，所谓的热血“兄弟情谊”也是少不了的。在军教片的最后，通常免不了来一场演习，也许是因为在整天扫地的军旅生活当中，演习还比较好拿来说嘴吧！

过了几年，当局不爽了，认为这些题材电影大部分都是打打闹闹居多，却不宣扬军人正面形象，故不再支持这类片子的拍摄，因此军教片也在台湾电影题材中

没落下来。到现在，《报告班长》这部片还一直被拿来回放，当我转台转到这部片时也都忍不住停下来看一段，回忆一下那段难忘又不愿再想起的日子。

电影《报告班长》的海报

（长篇）《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6]

1987 琼瑶剧《庭院深深》盛况空前

这一年，琼瑶阿姨小说改编的连续剧《庭院深深》在华视的八点档播出时，也造成极大的轰动。在那时，琼瑶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在电视上播出。在之前的两年，已经有《几度夕阳红》和《烟雨蒙蒙》播出过了，有很多人喜欢，但都不如这一年播出的《庭院深深》盛况空前。

前面有提到，所谓“八点档”，就是台湾在只有三个电视台时，三台皆会在这八点黄金时段播出连续剧。这个时段也成为收视率比拼的主战场，因为这个时间是大部分家庭吃完饭，也洗好碗的时间，所以，全家都刚好可以在这个时间等在电视机前收看连续剧。在《庭院深深》播出的时候，我娘总是想尽办法在八点

前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理好，时间一到，主题曲一放，就已经准备好水果或零食，坐在电视机前了。

《庭院深深》迥异于过去琼瑶小说直线式的剧情，而以两段式故事，外带一点儿悬疑的剧情紧紧扣住人心。那几年，琼瑶小说改编的连续剧，男女主角肯定都是秦汉和刘雪华，还有一些基本的琼瑶剧班底，如赵永馨、林在培、李天柱等人。在《庭院深深》里，刘雪华饰演的章含烟嫁入种茶叶的柏家，因婆婆的反对硬是被拆散。就在一次冲突当中，章含烟在台风时掉入暴涨的溪水中下落不明，而柏家的山庄也在不久之后遭大火焚毁，秦汉饰演的柏沛文也因此失明，从此，柏家大宅也流传出章含烟鬼魂的传说。

整部剧的剧情以刘雪华饰演的家庭教师方丝萦入柏家教小女儿读书开始，其实章含烟没死，她只是以方丝萦这个新的身份回到柏家而已。因为家教的关系，她开始跟她的亲生女儿朝夕相处。整个柏家上下，也只有智能不足的翠珊认出她，但大家并不把翠珊讲的话当回事。于是，通过方丝萦，观众一步步了解了十年前那场悲剧的真相。

因为剧情太扣人心弦了，以至于全家人都为之深深着迷。每次，我跟妹妹都会瞄妈妈有没有看着看着又哭了。

我总是恶作剧地问：“你怎么又哭了哦？”

妈妈擦擦眼睛说：“你们小孩子不会懂的啦！”

这部剧得到很大的成功，每当广告当中播出《庭院深深》收视率突破 50%时，我们还会大声欢呼，好像与有荣焉一样，其实关我们屁事！不过当时的确是，如果没看《庭院深深》，第二天到学校都不知道要跟同学讨论些什么了。

这部片子实在太吸引人了，几年后在中午一点回放时也造成了高收视率。而再过几年，宽带出现了，我、我妈、我妹三人，也是挤在电脑前，看着那华视网站上 520kbps 小视窗传来的画面。

这部片同时也捧红了唱主题曲的江淑娜。当年，所有人都会哼上那么一句“哦堆积堆积.....哦堆积.....”不过小孩子们总是喜欢自以为有趣地唱成“哦飞机飞机.....哦飞机.....”此外秦汉打刘雪华巴掌，下手好重，刘雪华每次一被打完一定趴倒在地，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琼瑶小说很少被文学评论家称为“经典”，批评者常常说她的作品总是过于梦幻缥缈，不食人间烟火，男女主角都不用吃饭大便之类的话。不过也没有人能否认，她的小说曾在受到苦闷升学考试压力之下的台湾女学生中争相传阅，一解怀春之情。若是没有了琼瑶小说，台湾的社会生活史将有很大的缺憾。

她的小说最早以改编电影为主。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台湾，有所谓“双秦双林”的说法，即琼瑶小说改编电影里的固定班底：男主角的秦汉、秦祥林，女主角的林青霞、林凤娇。他们演出的这些梦幻式爱情电影，可说是当时青年男女效仿的对象。这类剧情通常都是两男两女的复杂多角关系：他爱她，她却不爱他，但她又爱着另一个他，不过他也不爱她，这样如琼瑶小说里绕口台词的错综复杂关系。此外，这类电影的剧情也常在咖啡厅、舞厅、客厅三个非常固定的场景，既健康（因为不随便进房间），又唯美，因此也被戏称为“三厅电影”。

早期大家都说琼瑶打造的是“爱情王国”，这倒也贴切。她从写小说、编剧本、自组电影公司拍电影，再自写主题歌，一贯是一气呵成。其实每部片的剧情都差不多，男女主角特立独行又感性纤细，若即若离，

充满诗意的名字，以及如诗如歌的文艺腔和爱情语言，如同她的电影都有一套 SOP 般，再加上一定要有的经典画面——男女主角各在海滩一隅，在飘逸的海风中慢动作向对方奔去，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影像。

到了电视剧的时代，秦汉及刘雪华变成非常固定的银幕情侣班底。老实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秦汉永远是优柔寡断的富家公子，刘雪华永远是出身平凡的上进少女，每次都一样，但每次家庭主妇们还是被剧情紧紧吸引着。所以，这部《庭院深深》可说是琼瑶在剧情上的新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长大了，全家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了，我总是想起那段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庭院深深》并讨论剧情的情景。

电视剧《庭院深深》剧照

解 严

1987 年的解严，解除了在台湾长达 38 年，号称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这件事对台湾绝对有极大的影响。

虽然戒严对一般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太直接的影响，但就跟前面说到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一样，对心理到底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莫名其妙地牵连到。戒严时代，社会看似和谐，其实是暗潮汹涌。所以一解了严，就如同压力锅爆开来一样，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参与各种抗争的分子，从基层的计程车司机、农民、工人、老兵、少数民族，一直到牧师、作家、教授等，社会上不管什么阶层，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压抑已久的各种力量顿时激荡而出，各种反对运动、社会运动突然有了宣泄的窗口。让人眼花缭乱的议题，从民主一直到劳工、环境、人权与女性等，每一个议题看起来都是那么让人血脉喷张。上街头的人士也陶醉在革命般的激情中向前冲。那是一段警察与抗议者对峙、棍棒与乱石齐飞、拉布条抗议及举牌警告的年代。

旧秩序已经崩解，但新观念还没开始建立，所以每天电视一打开，看到的尽是这些混乱的场面，给过惯旧有保守稳定环境的人一种社会失序的印象。

虽然解严了，但是电子媒体仍受到当局控制，对相关社会运动的事件也倾向于一言堂，许多议题诉求都被

模糊化，而一律以暴民代之。但是，当时有个非常流行的“地下媒体”，就是在各大竞选及演讲中才买得到的一个自称“绿色小组”所拍摄的录像带。这个组织扛着摄影机到各个不同的抗议场合，在当时的各个场子里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拍摄不同于当局掌控下一般媒体所叙述的真实。因为都是在抗议的第一线拍摄，那有时晃动得令人晕眩或免不了被喷到水的镜头，以及站在抗议方这一边不断向前冲或逃跑的场面，不管是视觉的震撼力，还是对事件真相赤裸裸的描述，到现在看起来都还绝对是生猛无比。

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看“绿色小组”拍的片子，但那时看的只不过是一种影像的刺激，后来上大学跟同学聊起这件事，才发现许多人都看过他们拍摄的这一系列纪录片，而且这些录像一定都是被爸爸好好收起来，自己偷拿出来看的，大家聊得津津乐道。“绿色小组”也是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台湾纪录片发展史上，头一次由人民拿着摄影机而提出不同看法的组织。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89 股市首次上万点

20 世纪 80 年代末，整个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气氛，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刚开放，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突然变得有钱，整个都是暴发户急功近利的心态，尤其这年的股市首次上万点，更是将这种气氛推向最高峰。

那几年的台股大起大落，最后居然还到了一万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任何金融及商业法则都不适用的，只能说，群众一窝蜂的盲目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背后操纵这一窝蜂的大户。台湾股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才开始，到了 1986 年时，才刚破一千点而已。但自从破一千点后，在短短九个月内就破了两千点，再过两个月，破了四千点。其中遭全球股灾影响，大跌重挫 51%，1987 年 12 月跌至 2298 点。虽然这时已经有人看出，台股根本就是底气不足，因此才在全球股灾中伤亡惨重而发出警告，但这怎么能抵挡得住整个社会的一头热呢？

半年后的 1988 年 6 月，台指反弹，突破 5000，7 月 6000 点，8 月 8000 点。涨幅太快，导致当局不得不出面干预，开始征收资本利得税，又重创股市，马上跌到 5000 点以下。但被冲昏头的投资人，心里预期

的都是一万点。而当时当局也害怕失去民心选票，在政策上不敢坚持，便顺应民众做出些让步。到了 1989 年 6 月，台指终于突破一万点，1990 年初达到一万两千多点的新高，简直就是上下欢腾，全民如同集体嗑药般 HIGH 到最高点。

股市像无限提款的提款机一样，不管怎么买都会赚，就算你不懂什么是月线、季线、K 线，就算你买一些鸡蛋水饺股，依然能被炒得老高而大赚一笔。炒股成为全民运动，或者应该说，突然而来的暴富，使大家突然间有些不知所措而开始迷失。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通通投入了股市；不管是商人、军人、工人、读书人，甚至是出家人，皆为此而着迷。媒体也大幅报道什么“炒股神童”之类的神话，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堆教人如何炒股致富的书。当时有个名词叫“菜篮族”，即一些家庭主妇提着菜篮本来应该到菜场买菜，却跑到“号子”（证券公司）里看股票去了。于是，股市也造就了一堆新富阶层的富太太们。当时股市九点开盘，十二点收盘，整个交易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所以那些暴富的太太们生活得可滋润了，收盘之后先吃结伴大餐，下午再来逛街、唱歌、

跳舞、购物什么的。因此，号子旁出现了一堆高级餐厅，百货公司的生意也随之大好。

此外，股市一片大好对社会的冲击更是明显，比如工人发现炒股比工作更好赚，干脆不工作了去炒股，造成劳工短缺，许多公司的产品无法顺利交货。工厂老板索性把工厂给卖了，因为炒股有更高的利润。公务员也在炒股，干脆去办公室打个卡就跑到号子里，造成行政效率降低。在学校里也差不多，有些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戴着耳机收听股市行情，听到一半就突然叫小朋友自习，自己跑出去。小朋友在学校也开始攀比谁家里赚得多，谁买得对，哪支股有潜力，仿佛大家都可以上电视当“老师”一样。而大学生干脆课也不上，专心炒股。更令人觉得夸张的是，在证券公司里上班的倒茶小妹，也领着一般上班族羡慕的高薪，年终奖金居然能领到几十个月的薪水那么多。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两个朋友相遇，一位朋友问另一位，“现在几点了？”朋友很自然地回答，“一万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台湾社会简直是全民狂欢，病态的疯狂。

难道当局没有什么干预措施吗？当然，有识之士看出了其中的许多危机。简单来说，当时台湾刚解严，除

了民主化加快外，经济自由化的速度更快，相对地，行政力量也在减弱，“国会”力量又开始膨胀。但想进入“国会”，选举可是要钱的啊！所以，财团们索性送人进“国会”或支持特定“国会议员”。因此，每当当局提出干预措施，就有民意代表或政党人士反对，迫使行政部门让步。这样的结果就是，“国会议员”、金融市场、财团统统被绑在一起。

当然，这种炒出来的盛景，仍要回到市场规律内，“擦鞋童理论”仍然是有道理的。接下来的股灾，加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致命一击，导致股市在半年内跌掉了一万点。许多人倾家荡产，最可怜的还是大部分散户，在高点时一窝蜂跟着买，但等到崩盘后，连续跌停，想卖也卖不掉。这时，社会上充满了焦虑的气氛，自杀，甚至是带着全家自杀的新闻时有耳闻。

当时班上就有个同学，家里靠着股票大赚了一笔，简直不可一世，大家都想巴结他分些小好处。但股票崩盘后，他家也跟着破产了。这时候，大家反而落井下石，嘲笑他，他受不了这种嘲笑，不久后就转学了。死小孩的邪恶劣根性在此暴露无遗。

这一时期的暴起暴跌，使得整个台湾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一切回到原点。但至少也让大家了解到，股票不是那么好赚的。

股票上万点，请来“财神”讨个吉祥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0 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

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立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立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 20 世纪 90 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那年 2 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 9 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 1949 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

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 30 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

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

图为 要求“国会”全面改选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1 中学生的政治价值观

1991 年的 1 月，海湾战争爆发，全台上下的人都很关心。与其说是关心，不如说更多人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娱乐话题在讨论。许多人都知道，CNN 是在这次一战成名，因为这是世人第一次可以及时看到战场实况，因此，许多人根本就是守在电视前看报道的。在学校，因为教室里没有电视，所以一到下课时间，一堆学生就跑到老师办公室外面，围着看电视里的报道。对于联军及伊拉克两方的态势、飞毛腿飞弹或爱国者飞弹，每个人都好像是专家一样，说得头头是道。

另一件事是苏联解体。当时已经是暑假了，那一天，我跟爸爸在外地玩，夏天的酷热让我在车上昏昏欲睡，突然听到广播中传来苏联解体的新闻，头好像被炸了一下，立马醒过来，不太敢相信。

台湾那两年也有几条新闻让人印象深刻。最让文艺青年惋惜不已的是作家三毛的自杀。我没看过三毛太多的文章，但也是看着她翻译的漫画《娃娃看天下》长大的。许多女同学为了她的死，好一阵子愁容满面，茶不思饭不想的。后来我大一点儿时，再看这部南美漫画家季诺的作品，颇能感觉到欧式风格，人物造型及个性极其简约苍白，就跟随处可见的芸芸众生一样；许多桥段都有隐喻，结合作品产生之时南美洲的政治

气氛，再比对这部漫画刚出版时台湾的政治风气，就会发现有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心照不宣。三毛在生前写的最后一首歌词《说时依旧》，由林慧萍演唱，也成为当时的畅销曲。读者只能通过这首歌，去怀念这位一向给人乐观独立感觉的女作家。

比较重大的政治新闻是，台湾当局成立了“国统会”及海基会，希望能以对等的立场与大陆展开各方面的接触及谈判，这也促成了 1993 年的“汪辜会谈”。另一件事是，那几年间，一些欧美国家开始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比如美国的 F16、法国的幻象 2000、拉法叶舰等。其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拉法叶舰军售案”。1993 年发生的海军军官尹清枫命案，牵扯出全球最大的军售弊案，连带着后来一些相关事件人或追查者，不分国籍，纷纷神秘死亡，故事简直可追《死亡笔记本》的那种离奇。那可以说是台湾 20 年来最大，也是最神秘的悬案。

其实，在初中阶段，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大都还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因为台湾政治气氛的逐渐宽松，老师们也比较敢在课堂上发表些意见。当然，不同老师会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顾忌家长的抗议，大多也都不敢

太明讲，因此在课堂上也常会灌输一些政治思想给学生。

“各位同学，我们都是生长在台湾对不对？那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是不是要好好爱这块土地，学这块土地的语言呢？你们大家都知道长江、黄河的长度跨过哪些省，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浊水溪的长度？能不能排列出台湾从北到南的县、市名呢……”

印象深刻的是有个音乐老师，上课时教我们唱了一首好像儿歌的歌曲。

“乌鸦黑，乌鸦白，乌鸦是黑还是白？你说乌鸦黑，我说乌鸦白，乌鸦是黑还是白？”

这首歌的曲调是用闽南语民谣《雨夜花》来唱的，而《雨夜花》歌词开头是“雨夜花，雨夜花……”用闽南语读起来刚好就是“乌鸦黑”的谐音。所以，当时只觉得这首歌还蛮有趣的。

过了几年，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主持人提到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以前一些“政治犯”编出来讽刺司法黑白不分的戏谑歌，并不是字面意义那么简单。那这位老师到底为什么教我们唱这首歌呢？

老师喜欢隐晦或直接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当然，大陆的朋友很习惯地会将台湾的政治光谱简单地二分为

非蓝即绿。这样分过于粗略，至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段时间，还没有这种区分。又或者说，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到现在，大多数群众虽然心里有政治取向，但并没有多深。只要公民们觉得哪一个政党或候选人能带给他们好处或前景，就支持他们。当然，这也是他们二十几年来不断自我学习的结果。

反正，初中生的确是有一些初步的政治思考。但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台湾学生长期受到填鸭式教育下“标准答案”的影响，再加上看得不够多，思考过于粗略，也常常流于二分，非黑即白，容不下其他人的政治价值观。

那几年，国民党党争非常严重。先是二月政争告一段落后，李登辉用了军人出身的郝柏村任“行政院长”。对这件事的看法，同学们大都是从家里听来的，不外乎“军人干政”之类的。另外有些同学就反驳啦：郝柏村的强势作风让社会治安改善了很多，果然还是应该让军人来做这些事。

李登辉、郝柏村这对搭档被称为“李郝体制”。李登辉当时说他们是“肝胆相照”，合作无间。不过李登辉老谋深算，当然会料到由郝柏村引来的反对声浪。

当时李登辉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只剩下军方还未掌握，因此他沿用了非主流派的郝柏村任“行政院长”，一方面堵住非主流派的口，另一方面借此架空郝在军中的影响力。

等到李登辉觉得他已经可以控制军方，不再需要郝柏村了，便开始将其权力架空，郝柏村自认受辱，不干了。到此，“肝胆相照”变成“肝胆俱裂”。之后，李登辉起用了连战担任“行政院长”。

为此，同学们也会讨论这些话题，但大多流于表面，没有自己的思考，因此聊一聊，发现聊不下去后也闹得不欢而散。套句台湾网络最近的流行语就是：“你的王道不等于我的王道！”不过，当时大家都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一群脑残的初中生。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4 千岛湖事件

1994 年的时候，台湾政治缓和了，“国统会”成立，“国统纲领”也颁布了。前一年举办的“汪辜会谈”，

也是海峡两岸 50 年来的首次协商，两岸一切都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在当时，支持“台独”的声音虽然已经可以公开宣传，但也成不了主流，倒是一般民众心里总觉得，不管喜不喜欢，两岸最终都会走向统一。但这年开始的几个事件，却又开始让两岸关系走向恶化。

首先就是这年的“千岛湖事件”。这起事件中，在浙江千岛湖游船上的台湾旅行团及船工一行 32 人遭到劫船并灭口。

在“千岛湖事件”之前，台湾是有一阵“大陆热”的。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虽然只能以“探亲”的名义赴大陆，但台湾当局虽不鼓励却默许一般民众到大陆从事各项活动。其实在台湾的俗语当中，有很多都是跟大陆地名有关的。比如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就是代表一个人的牛脾气非常顽固，就算换个环境也还是一样；还有“去苏州卖咸鸭蛋”，则代表某人往生去也，驾鹤西归；“乌鲁木齐”则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意思。台湾人对一些大陆地名都听过，就是太陌生，而一开放到大陆后，电视台上也开始出现了好多介绍大陆锦绣河山的电视节目，对从不认识大陆的台湾人来说，看了真是向往不已，所以旅行团也是

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陆各处旅游。当时，在台湾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穿着写有如“我登上了长城”、“桂林”（不过下面图案居然是熊猫）等字样的文化衫，现在看起来虽然蠢得不得了，但在当时的确很流行。这种情况，到了“千岛湖事件”后，一切都改变了。好一阵子，台湾几乎没有旅行团前往大陆。千岛湖很长一段时间变成台湾旅行团的旅游禁地。在电影《赌神二》里，赌神高进在散心旅游，来到了“千赌湖”，遇上劫船事件，就是改编自“千岛湖事件”的。

1995 风波

约莫是从 1992 年年底开始，在台湾的教会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言，说是上帝憎恶台湾社会的混乱，公义荡然无存，为了审判台湾，在 1995 年会让大陆攻打台湾以作为惩罚。而这个传言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国回来的余姓传道人。他自称原本是做生意的，但上帝给他启示，看见这个异相，在台湾各地宣讲他所看到的。这件事在台湾的教会界引发了大地震，也连带着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造成当时一拨的移民潮。

这件事印象甚是深刻。当时这位余先生为了宣讲他的信息，走遍各大教会与团体，与台湾许多牧师交换意见。又或者说，余先生非常固执地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以《圣经·旧约》中的守望先知自居，抵挡他的就是灭亡之子。当时我家里有场地，父母开放每礼拜四在家中举办聚会，这个聚会每个礼拜会请不同的牧师或讲员主理。很自然地，余先生也成为某次聚会的讲员。他在讲座里引用各种资料以及不断强调上帝给他的异相，说得大家心惊肉跳的。因为家里的这个聚会在教会圈子里还算有些名气，参加者不少，而这次的主题又非常敏感，因此不待余先生讲完，只见坐在里面的那些教会领袖及大头级的人物，个个脸色凝重，时而交头接耳。当然，这些教会领袖基本上都是持保留意见的。

在此之后，余先生继续传播他的灾难预言，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教会领袖们见此风不可长，邀请余先生公开辩论，且要他节制言行。当然，立场不同没有交集，也就不了了之了。总之，这件事几乎造成了台湾教会界的分裂。接下来，又有人传言，上帝为台湾的基督徒预备了“流奶与蜜之地”，就中南美的贝

里斯。结果，一批基督徒，甚至是整个教会中的牧师带着信徒，都逃到贝里斯去了。

后来，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个自由撰稿人郑浪平的关注。他被启发灵感，写了一本书《一九九五闰八月》。这本书从各种角度，不管是政经军事，还是历史灵学角度来分析，指出历史上每逢农历闰八月都会发生重大事件：第一次在 20 世纪，1900 年八国联军；第二次是 1957 的“反右”斗争；第三次是 1976 中共领导人相继去世；第四次，他又引用推背图推断，这一次中共将在 1995 的闰八月时攻打台湾。如此耸动的说法，立刻在台湾社会造成轰动。当然啦，他的说法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但这本书顿时洛阳纸贵，再版又再版，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结果那阵子也出版了许多搭顺风车的书，名字都挺耸动的，什么《台湾大灭绝》之类的，危言耸听搞得整个社会风声鹤唳，许多人也跟着移民。

后来黄安和林瑞阳还合演了一部电影，就叫《一九九五闰八月》，不过情节跟政治无关，是部搞笑电影。虽然书中提到台湾教会有人在传 1995 年大陆攻打台湾的预言，但大多数的人的确不知道，《一九九五闰八月》这本书的原始构想脉络是作者从当时基督教会

里的传言得到的灵感。这些书，这些人，这些事，十年后再来看，只能一笑置之。但这件事不仅仅是社会上的一小风波，更可以从中看出，在台湾人心中，面对大陆越来越强大的一种敏感与焦虑。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4 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

以台北市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这段时间，有许多重大工程在同时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快捷运输系统，简称“捷运”工程的进行。也不全然是地铁，捷运工程有地面、地下、高架三种，并且好几条在施工。所以那时候台北市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工程在进行，因配合地下开掘，地面上到处是铺满了钢板的临时马路。那段时间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塞车问题特别严重，再加上捷运弊案连连，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跌到了最低点。当时的台北市长是黄大州。其实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事情也在做，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官僚系统的古板腐化，再加上这几年的施工问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

所以，大家都认为 1994 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是个改变的机会。这是台北市改“直辖市”以来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以前都是官派的。因此，这次的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同时举行的还有同样是“直辖市”的高雄市长选举，以及台湾省长选举。我就提一提跟我住的台北市比较有关的选举吧！

这一次的选举是三强鼎立：国民党的黄大州，新党的赵少康，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时形象佳，派一个形象声势都不错的赵少康出来选自然没什么问题。而黄大州，许多人认为李登辉让他出来选是为了要搞垮国民党。其实，虽然当时大家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政绩，但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算是四平八稳型的，不让他出来选市长也是说不过去。

民进党这边可复杂了。当时如日中天、一时瑜亮的陈水扁和谢长廷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前面说过，两个人都是一同从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发迹，并在台北的同个选区担任过市议员及“立法委员”，可说是亦敌亦友，在这次党内提名中，谁也不让谁，竞争激烈。但戏剧化的是，在党内初选的前一刻，谢长廷宣布退出初选，全力挺扁。

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黄大州，所以基本上也是陈赵两人相争。在这两个人里面，大家是很难抉择的，因为都是一时之选。我个人认为，最后陈水扁会胜出，跟竞选主轴有很大的关系。当初，赵少康阵营把这场选举的层次提高到了“中华民国的保卫战”，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只不过是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已。

“有那么严重吗？”陈水扁当时就喜欢用这句有点儿戏谑讽刺的话反问赵少康。

所以，当时赵少康反而给人更激进、有某种政治洁癖的感觉。反观陈水扁阵营打出的口号“快乐、希望”，整个竞选气氛就给人一种办嘉年华会般快快乐乐的感觉。

所以啦，当时的民调，以年龄分布大概有这样的结果：中年以上支持国民党的居多，中产阶级支持新党的居多，年轻一点儿的的支持陈水扁的居多。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支持陈水扁的，不过他们没有投票权，只能跟着摇旗呐喊而已。

说到摇旗，这次选举也有些创举，就是第一次有竞选用的宣传旗与竞选主题歌出现。一时之间，能看到街上许多的汽车、摩托车，尤其是支持陈水扁的计程车

车队，车上都插满了旗子满大街跑。当时的竞选主题歌，除了后来变成新党党歌的《大地一声雷》外，就是陈水扁的《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了，尤其是后者，因为曲调悠扬歌词优美，有好一阵子都是KTV里的点播冠军。总之，民进党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就是从这次选战开始的。

所以，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许多同学喜欢将陈水扁的竞选旗帜缝在书包内侧，每次一看到有人翻开书包露出那面旗帜，自己也会装作无意地露出那面旗给对方看到。而支持新党的同学，也会把新党竞选时的那件红T恤穿在制服里面，并有意无意将领口放开两颗扣子给其他人看，这样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对方是“同志”了。现在想想，这种愚蠢的行为倒也不是真的在挺扁，因为学校上层或教官大都还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这么做应该是种青春期特有的、藐视权威的叛逆行为而已。

陈赵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几乎是一种欢乐气氛与悲壮气氛的对决。情势非常紧张，选举前的最后关头，甚至传出了李登辉弃黄大州保陈水扁的说法。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持保留态度啦！因为黄大州声势本来就弱，就算陈水扁有百分之五的

票是从他那里争取过来的，扣掉这些票，陈水扁还是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分裂是造成陈水扁这次当选的原因之一。

至于在台湾省长方面，国民党的“宫廷大内高手”（当时对手这样称呼）宋楚瑜最终胜出，高雄市长也是由国民党的吴敦义胜出。

市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但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对于只看结果的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

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政府）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

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扁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陈水扁当年最经典的照片

《我们台湾这些年》当当网独家火爆抢先发售（点击进入）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台湾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7 高中“三民主义课”

当时台湾的高中课程，除了国文、英文、数学、文组学的历史地理、理组学的物理化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课程是两个组都要学的，那就是“三民主义课”，即孙中山先生所创之民族、民权、民生的学说。说实在的，这类政治思想的课程教了几十年，刚开始不免

有为政治服务的意图，但在台湾越来越开放的时代，课程的编排不得不随着时代而有越来越多的变化。当时很多教三民主义的老师，可都是“三民主义研究所”——简称“三研所”的硕士生毕业的。不过你想，孙文的三民主义专著都已亡佚，现在看到的都只是他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稿而已，这样居然也能发展成一套学说加以研究，真是不得不佩服那些加以“阐述发展”的学者了。

而高中的“三民主义”，的确是一门非常需要记忆力的学科，因为在联考里，这门科目是要考申论题的。但所谓申论题，也不是“抒发己见”的申论，而是假申论之名，行填写有标准答案的默书之实，简直就是集填鸭教育之大成者。所以啦，在当时，大家都习惯把三民主义课本“分解”，拆成一章章重新装订粘好，变成薄薄的“易读本”，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背。补习班居然也开三民主义的课程，而且专门教你怎么去背，怎么去写才会拿高分，还发明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口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就是标准答案，按课本内容写出的，偏偏就还是要给你扣个一两分，因为，申论题是不可能得满分的。还好，后来全部改成选择题来考，简直就是可喜可贺。

说也奇怪，明明就是“三民主义”，但是课文里蒋介石说的话永远都比“国父”还多，套用一个现代一点儿的语汇就是“消费”孙中山。并且，课文里每说到一个理论，就会有这种格式出现：“首先”是“国父”说，“其次”是蒋介石说，“进而”是蒋经国先生说，“然后”是李登辉说。并且其间穿插着编者好心使用的连接词，内容繁杂，各种标点符号，如冒号、上引号、下引号及挪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可以说，只要高中三民主义学得好，背得好，将来专门帮当局写政令文书都易如反掌。不过，在那已经开放一阵子的社会里，课程再这样继续编排下去，实在不符合时代性，所以，课程也出现了些简单的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发展、政府运作、自由民主之类的。反正，不管怎么写，最后一定会有个结论：三民主义好。

三民主义在联考中改成只考选择题后，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很多，但台湾的学生受到“三民主义”课程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说起“三民主义”就能信手拈来。前几年，网络上就有轰动一时的恶搞小说《铁拳无敌孙中山》，用港漫里《天子传奇》的模式，把孙中山由一位文弱书生，变成一个身负惊世绝学的真命天子。

而里面的招式，当然就都是引用些孙文学说的名词，比如说五拳“宪法”：行正拳（行政），雳法拳（立法），丝发拳（司法），烤世拳（考试），奸铡拳（监察）。三明主义：明拳（攻击），明足（轻功），明身（内功）等招式。

后来，三民主义研究所开始转型，慢慢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中山所”之类的，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偏向多元化的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好像三民主义背负着什么原罪一样，生怕留着这个名字，就没有人想要读。

这一系列小说，曾在台湾论坛上引起风潮

1997 年过世的名人

1997 年去世的名人还真不少，每件事似乎都对台湾产生了一些影响。首先，就是年初的邓小平逝世。他逝世的隔天，台湾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做了大篇幅报道，引发新闻战。因为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一次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到最后大家都已经搞不清楚是真是假了，所以等到这次消息一发布，新闻界又乱成一团。而这

次最引人争议的是《中国时报》，除了头版“中国时报”那四个字是原来的红色外，全版都是黑白的。结果民进党人趁机批了《中国时报》一番，认为《中国时报》“媚共”，引发了一连串的口水战。

但邓小平之逝世，的确让台湾紧张了一阵子，战备程度提升了很多。那几天，各报也在不断报道邓小平过去的经历及政绩。

到了8月，考完联考，正在等待入学的那个炎热的、懒洋洋的下午，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广播新闻中的插播传来黛安娜王妃车祸身亡的消息，马上惊醒过来，还以为刚才是在做梦，等到打开电视才确认是真的。

结果那一阵子，像我爸那一辈的男人简直就是无限的欷歔呀！当初黛安娜世纪婚礼时的风采可说是迷死他们那一代的男人，爸爸甚至好一阵子都在怂恿妈妈去做个黛安娜的发型。所以，那阵子，每当他打开电视看到黛安娜去世的后续消息，都会感叹几声。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更深的是在她的葬礼上，艾尔顿·约翰的那首《风中之烛》。

过了几天，世界知名的特蕾莎修女也过世了。我还记得黛安娜王妃过世时她发表的简短谈话，没想到没过几天她也跟着过世了，真是生命难测。紧接着，教会也开始了一连串的纪念活动。

年底，张雨生车祸去世，这位陪着我们那一代人一起长大的音乐才子就此陨落。那时的张雨生，已经转到幕后，并成功捧红了张惠妹。在更早之前，他可说红透了半边天。虽然他跟许多歌手一样，当兵之后就不如当兵前那么红，但大家也记得他当兵那年，台湾的区运开幕典礼上，有一架军方的直升机从天而降，直升机上走下一个穿军服的阿兵哥，随着音乐开始高声唱《我的未来不是梦》的那个震撼画面。他退伍后，成功地从偶像型歌手转型为创作型歌手。不过他也慢慢被主流大众所遗忘，直到他车祸去世后，又勾起大家对他的回忆。大批歌迷拥入“国父纪念馆”，等到《天天想你》的音乐响起时，大家都哭了。

那几年，台湾的有线电视台有专门播出日本电影的频道，所以我也大量收看日本老电影，尤其喜欢看日本的武士片。所以年底，演过《罗生门》，经常饰演宫

本武藏以及许多硬汉角色的日本演员三船敏郎的过世，也让我感叹不已。他也是许多台湾老一辈人的偶像。那阵子，三船敏郎的纪念合集推出，虽然很贵，但卖得特别好，据说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买去的。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0 年台湾地区“大选”：“国民党内讧”导致陈水扁当选

2000 年的 3 月 20 日当天下午 5 点开始，全台各地的民众几乎都守在电视机旁，或者听着收音机，紧张又期待地收看或收听台湾地区“大选”的开票实况。各电视台也很应景地，在开票实况中加入战鼓或充满壮烈的背景音乐，更增添了让人不得不屏气凝神的气氛。开票过程简直就是缠斗，陈水扁与宋楚瑜两人的得票数一直互有高低，大家都在期待下一个开出的是自己的票仓，再度胜过对方。反而是实力及资源最雄厚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电视上陈、宋两人的竞选总部前，人都聚集得越来越多，反而是连战那里人越来越少，颓势已现。最后，陈水扁阵营

以三十多万票的优势击败宋楚瑜。回首这次选举，陈水扁从一开始未被看好一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内外的因素夹杂，过程可说是戏剧化的。

前面提到，冻省之后，宋楚瑜就已经跟李登辉反目，但仍然留在党内。以宋楚瑜的个性来说，怎么就甘心这样被摸摸头乖乖蹲着呢？所以到了 1999 年，临近“大选”前，国民党内部提名态势日趋明朗，理所当然地由当时的“副总统”连战出任候选人，而在国民党内部，仍是希望能够力拱连战和宋楚瑜搭档参选，这才是黄金组合。

但宋楚瑜终于出走脱党自行参选。他以原有的省长政绩为基础，以“勤政爱民”和“清廉”为号召，再加上挑选了本省籍的医生张昭雄作为副手后，声势一路看涨，一度将对手抛在后面，顺利地完成无党籍候选人的联署。

“连宋配”破局后，国民党找了萧万长作为连战的竞选搭档。

在民进党方面，由陈水扁出马竞选。两年半前，他在台北市长落选那一晚，支持者就拱他出来参加“大选”。加上 1997 年他组了一个“宝岛希望助选团”，走遍全台湾为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助选，掀起一股“陈

水扁旋风”。他启用了当时任桃园县长的吕秀莲作搭档。唯一的小插曲是，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因争取党内提名未果，遂也脱党参选。此外，李敖也决定参选这次的“总统”，但象征意义还是大于实质意义。所以，2000年这次“大选”，候选人虽然有五组，但实际上，是连萧、宋张、陈吕三组人马在对抗。选战前期，国民党几乎是动用一切资源在为连战辅选，就如那时当兵的同学好几个都跟我说，他们那阵子一直都在看《抢救雷恩大兵》（大陆叫《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片，看过两三遍了，辅导长还会暗示：“选陈水扁就可能会成为战争，大家可不希望战争对吧。”陈水扁阵营可也没闲着，陈水扁当时的文宣战非常高明，主打年轻改革的路线，又推出了周边商品，这次新推出的是“扁帽娃娃”。而当时他的电视广告可都是名家亲自操刀的，无不让人动容。虽然陈水扁后来做得够烂，但那些广告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是让人激动不已，有一些甚至被誉为台湾选举史上最成功的电视广告，自然这样的诉求会打动人心。可以说电视广告成功消除了陈水扁激进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温情、改革的形象。正如每个广告人都知道的，“不要卖牛

排，要卖牛排的滋滋声”。陈水扁这次奉行的原则是，“不要太卖政策，要卖当选后的美好愿景”。

2000 年，陈水扁的胜选之夜

终于到了“大选”前一天，三方各自又在全台各地办选前造势大会。当时班上有四分之三的同学都是到陈水扁的场子去，就在学校附近的中山足球场。于是下课后，大家带着自制的牌子旗子、造势晚会必备的高音喇叭，还有水和零食之类的，一群人就这样骑着摩托车往晚会地点去了。一路上，遇到许多也是要到现场去的民众，大家互相挥着旗子欢呼，旗帜鲜明地合流，搞得跟飞车党大会师似的。下午 4 点到了现场，许多人已经在现场抢好位置，等晚上 6 点晚会开始，真像是演唱会现场。

总之，走群众路线起家的民进党对于这种晚会啊活动什么的，对气氛控制一直是一流的，总是能把民众带到一种很 HIGH 的集体狂热境界。某某人士讲完了，可能会来首音乐表演，然后再来个台上台下的互动节目，接下来又换下一个人继续讲，反正不会让人觉得闷就对了。那天晚上的高潮是一人发一根仙女棒，全场十几万人同时点起来，璀璨无比，让人产生一种“选

给陈水扁台湾未来就无比光明”的迷幻感觉。当场大家心情激动无比，我也趁机在这种如见证时代般浪漫的气氛下抱了心仪的学妹好几次。接下来，又从台上滚下好几个巨大的，上面写着如“贪污”、“腐败”等字的充气大球，让现场民众用手顶啊顶的，一直把这些球顶到场外，代表用人民的力量将这些东西赶出去，哎……真是创意无限。

因为中山足球场刚好在台北市松山机场的航道正下方，接近跑道了，而松山机场的末班机通常是 10 点左右。那一天节目已经进行到晚上 11 点了，天上却传来飞机飞过来的声音，大家都很有默契地知道，那是李登辉或连战的专机飞回来了。结果等飞机飞过上空，果然看到那个“总统专机”，十几万人同时欢乐又示威般向着飞机喊叫，不知道当时他们在机上有没有被吓到。

反正晚会最后的高潮是陈水扁的演讲，但是很多人觉得已经 HIGH 够了，所以也不听完就先离场。半夜 12 点多了，路上还都是人，看见公车开过来，也不用管是不是站牌，大力地挥着旗子，车子就停了下来。民进党在那几年的选战很奇怪，只要基调是欢乐的，就会选胜，如果又打悲情牌，一定会输。但台湾人喔！

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那么疯狂，一过了选举日子还不是要照常过下去！这几年许多人已经不再那么狂热了，但是造势场子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玩玩的，到现场吃点儿小吃，听听演讲，乘乘凉，感觉还是不错的。

选举的结果是陈水扁获胜。就在陈水扁几乎确定要当选之时，“参谋总长”在电视上宣誓依照“宪法”会恪守军队本分，服从新“元首”。这段简短的话非常有意义，台湾从 1949 年来，首次结束国民党的统治，政权和平转移，平稳过渡。

但陈水扁实际上是在国民党分裂的情况下取得了“政权”，只拿到相对多数的接近 40% 的选票，只有“合法性”但没有正当性。接着而来的后遗症，都在后来几年慢慢出现，如“统独对立”、省籍矛盾、南北对立等。而陈水扁在任的 8 年实在做得不怎么样，让许多当初支持他的人极度失望。这一次政党轮替唯一比较有价值的，可能是造成 8 年后的再次政党轮替。民众知道了自己选票的力量，让这种轮替成为常态，政党也会有所警惕。

国民党选举失利的当晚，支持者在街上抗争连续数天，要求李登辉下台。结果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连战为代主席。翌年，连战当选国民党首次党员直选

的党主席。后来，国民党内部要求清算李登辉的声音不断，李登辉最终被开除党籍，李系人马在国民党内失宠，导致了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2 研究生考试

这年我去考研究生。台湾考研究生跟大陆不太一样，是各校自行招生的。所以要考研究生的同学，每到三四月份又要赶考折腾一次。有些比较优秀的学校，还会故意将考试日期排在同一天，非常的跼，摆明了就是你只能挑一所来考。尽管如此，还是吸引了许多大学生报考，并且研究生报考人数有每年越来越多的趋势。

因为个人的喜好问题，我挑了有关大陆研究的专业来考，所以那时候除了国际政治各种理论之外，也把一些《中国近代史》跟《中共党史》的东西都摸熟了。在此，举一些“中国大陆研究”科目考试题目的例子：

中共建立政权后，称自己为“新中国”，在此之前为“旧中国”，此说法已被广泛采用。到底“新”在哪里？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作纵向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维是什么？内在实质又是什么？

反正，不同学校考的题目也反映了不同学校的研究方向，有些学校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解释，有些学校喜欢从社会实际方面来解释。这次考试呢，我很潇洒，只报一所学校来考，所以没考上也是必然的。

这一年7月我又去北京了。不知道为什么，北京对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为了这个，我后来还特别去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北京建筑格局的影响，写了一堆论文发表。没想到每次一说起这些，还真的唬了很多入，应该也算得上一个二流的导游了吧！

反正这次就一路从南往北，沿着京广线玩到北京。到北京也没定下个目的地，就住在国际饭店后面的青年旅馆了，每天也无所事事，跟着一群老外瞎混。尤其是那群法国美少女，每天晚上洗完澡总是穿着蕾丝半

透明的睡衣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或半倚着沙发，让我看得几乎要喷鼻血。

过了两天，旅馆前台跟我说有两个台湾人也住进来了，一个是来自高雄的怪叔叔（我们如此称呼的），另一个就是小吴，基于“管理方便”把我们安排住一间。很快，小吴以那特有的热情与到处都能搭讪的人格魅力，很容易地让大家在短时间内打成一片。之后我才知道，他是第一次来大陆旅游，只在北京待五天而已。这段故事真正开始，应该从他入住的隔天开始讲起。这一天，他到长城去旅游，我则到西单乱逛。自诩为北京通的我，居然糊涂到在那里丢了钱包。更糟的是，我笨到把所有钱都放在里面，这下我可身无分文了。没想到我生平第一次进警察局，居然会是在北京西单的派出所里。我第一次深刻了解到什么是“走投无路”，只好跑去跟雕刻时光的庄仔借了钱，才暂时渡过难关。这一天，小吴回来得也比较晚，回来后看他脚一跛一跛跳着走，脚上还包着纱布。据他自己说，原来是在长城上，为了贪图走近路，直接从缺口跳出去，没想到这一跳就把脚筋给拉伤了，而且伤得还不轻，直接送往医院。但没想到，他在医院都还能搭讪到几个美眉，还将照片给我们看。

照理说，遇到这些情况，正常人都会马上回家的，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撑些什么。他呢，每天还是脚跛着跳着，到处去游览。至于我，跟朋友约好过几天到北京来同游，面子问题不好取消，又怕到时候没钱花，只好每天躺在青年旅馆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按着遥控器，一边用破烂的英语跟老外们鬼扯着，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到了晚上，大家都回来了，青年旅馆更热闹了。小吴也加入了谈话会，虽然外语一样破，但不管是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一样会被他逗得笑呵呵的。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起待在同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两个礼拜。接下来的日子里，终于等到朋友来北京，于是我们四个外加怪叔叔，也不拘泥于什么特别的景点，反正就是在大街小巷乱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亦快哉。

后来，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离别的时间到了，遂各分东西。怪叔叔跟朋友去了天津，我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小吴则到河南去了。

在上海跟朋友分开后，我一个人去了湖南。在长沙看了马王堆的博物馆，待了半天就往湘西去，当晚赶不

上到凤凰的小巴，遂在吉首待了一晚。第二天到凤凰，我一经过进入凤凰的沱江桥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住的位置又是无敌江景，就是虹桥旁沱江人家客栈的吊脚楼里。每天早晨，总是被捣衣及划桨声唤醒。我住在凤凰一个礼拜，每天也就到处看看，晚上回来睡觉，很优哉。

再见到小吴是几个月后在他的家里。看到他的旅行照片和听他讲述旅行经验，只有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原来，他后来一路到洛阳、西安、兰州、敦煌，又往西到了乌鲁木齐，最后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中巴边境上。真难想象一个第一次离开台湾的人，就这样飘呀飘的，一路飘到了大陆的最西端。说来真有勇气且不可思议，但他就是这样处处让人惊奇、随性所至的人。

隔两年，小吴在西藏前往阿里的路上遭遇车祸挂掉了，我也少了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之后我又到了北京，经过国际饭店，青年旅馆已经不复存在。又凭着记忆去找曾经一起吃过的胡同小餐馆，却也成为新建高楼。路过天安门，想起那年“八一”清晨，凑热闹似的去看升旗，触景生情，这些本应该是美好的回忆，想起来却让人一阵惆怅，坐立难安。

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

2002年，这年年底又要选台北市长了。在这种几年就一次“大选”的驯化下，台湾人其实已经习惯了每隔几年就来感受一下选举的狂热，选完之后，支持的候选人选上了就狂欢若喜，落选了只好唉声叹气。但不管什么反应，第二天虽然失落还是一样继续各过各的生活，就跟隔夜一定要全部消失的满大街竞选旗帜一样，突然消失了还真不习惯，就如同高潮过后总伴随着一阵空虚。

这次选举，国民党已经成为“在野党”。毫无疑问，这次当然还是马英九出来寻求连任了。说起马英九执政的四年，我自己觉得他做得还可以，形象也够亲民，但就是感觉他没做过什么。反正，马英九高人气。但民进党就是不知道要推谁出来选，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出来选胜算都不高。最后，民进党高层推出“行政院”秘书长李应元出战。

过去台湾的选举，不管各候选人的政见如何，越选到后面，选情越紧张，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奥步”^①。但这次的台北市长选举，虽然从一开始几乎就知道谁会当选，却是一次高水平的选战，双方都有很明确的

市政建设蓝图，也能很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政策。比起以前意识形态为主的诉求，这次选举完全是以政策诉求为主的。

不过这场选战，结果虽然大家几乎都清楚，但其中的暗潮却是汹涌，掺杂了许多诡谲色彩。陈水扁当然是为李应元助选了，甚至他的光芒还压过李应元，所以这场选战，也被视为陈水扁向马英九的复仇战，变成扁马对决。

而在这次选战中整合成功的国民党泛蓝阵营，将这次台北高雄市长、市议员一起的选举，定位为 2004 年台湾“大选”前哨战，造势活动频频将炮口瞄准陈水扁。

而马英九，当时普遍猜测他是不是也想争取 2004 年的台湾“大选”位置。所以，民进党也是倾全力在“打马”。结果，这一“打马”反而让马英九的政治地位在泛蓝阵营里急剧飙升，造就了马英九在泛蓝阵营的超级明星地位。

马英九的温和形象吸引了不少中间或浅绿选民，再加上泛蓝整合成功，也是这次马英九大胜的主因。

但在这次选举开票过程的电视实况转播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各家电视台各显神通展开计票追踪报道，

不管是请人在各开票所计算还是公布选委会的开票数，各家电视台的方式和渠道都不尽相同，都是为了争取最高的效率以及争最新的新闻。所以，在同一时间里各家电视台画面出现的同一候选人的得票数也不相同。有时候，由于相同时间内各电视台报出的同一候选人的得票数实在相差太多，不只把观众们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楚应该相信哪家，私下里，连各家电视台之间也相互打探对方是如何计算得票数的。这样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原来，各家电视台为了抢报最新得票数，常常会有票数先灌水的恶习，结果，有时候就灌过头了。甚至还有一家电视台，得票数在短短 30 秒钟之内缩减了 20 万票，居然票越加越少。所以，当时因为这次选举，各电视台被批得很惨。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5 在部队里过年

在我进部队不久后，就是 12 月 31 日了，这一天就如往常一样，整天都操课。尽管营舍房间的窗户就正对着台北 101，但总是越看越郁闷。当天晚上，约好同

梯次的弟兄，半夜 12 点整一起来看 101 大楼的灯光倒数，结果起床后才知道，原来没一个人醒来。

元旦的勤务对仪队来说是重要的勤务，因为三军仪队都要集合到“总统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所以凌晨 3 点就都醒来。于是，“菜鸟”们只好两点半就起床，准备好全队的早餐，等大部队出去后，继续睡到 6 点起床，才轮到我們吃早餐。

等大部队早上约 8 点回来后，会举行一年一次的祭旗仪式，就是把旗官房间里的各种旗帜通通搬到练习场，以鲜花素果供着，全队集合参拜。然后大部队就放假去了，留下菜鸟们用哀怨的眼神羡慕着。

再来就是农历新年了。菜鸟们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初二中午就收假，大吃大喝一顿后，看了两天的影片，第三天开始继续练枪法。每天晚上站哨，听到外面公园还在放爆竹，心情就跌到谷底。

第二年的元旦，隔天 3 点就要去“总统府”，但是半夜 12 点还是爬起来跑到顶楼上，跟大家看 101 的灯光倒数及烟火，因为变油条了。

说起台湾部队的春节假，大部分都是分三批放的。其实早在好几个礼拜前，对于春节时期该怎么分批放假，

谁要留守，放几号到几号，表面上看起来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关系啊！留哪一批都可以。”但私底下已经暗潮汹涌，对于回家过年已经是志在必得的事。并且，这一年过完春节马上又有情人节，所以放哪一批就显得很重要。

终于，某天晚上点名时公布了休假时程。第一批是过年前开始放到初二，第二批是过年前一天放到过年后几天，第三批是初二晚开始放，通常没人喜欢放第三批。

“想放情人节的就去登记第三批。不然，到时候就到楼上去打手枪吧！哈哈！”值星官以一贯尖酸刻薄的语气调侃着。不过没有人笑得出来，毕竟大家都想既过年又过情人节。我有了去年初二就被叫回来留守的不愉快经验，因此极力想放第二批，结果不幸，承蒙副连长厚爱，第一个就点我留守第一批，我只好一脸大便地排到旁边去了。

终于，春节留守正式开始，整个连上只剩不到 20 个人，整栋楼空荡荡的，显得异常冷清，几个人除了站哨外，也没其他的事。过去一直认为，一个人要很清楚地知道他今天做过了哪些事才算虚度光阴，也才是有意

义地度过了一天，糟糕的是，我几乎忘记了这几天都做过哪些事情。

那几天跟一般部队的作息很不一样。虽然还是每天早上 6 点起床，6 点 10 分早点名，值星官照例说了去打掃之类的话就解散，但大家总是又昏昏沉沉地晃回去继续睡觉，等到 7 点要吃饭了，才慢慢起床，但起床后通常又重重地躺了下去。这一段通常睡得都特别爽，接近 8 点时醒来，8 点点过名后，一天才算开始。

8 点集合后，大家作鸟兽散，不过通常都上了四楼 KT V 室，租了一堆 DVD 回来看。大家四散地躺着坐着，前面放映着影片，不看影片的人就在后面看漫画，打战国无双或看电视。留守的时候正值第一次直飞的两岸春节包机，一台华航空巴客机就这样毫无悬念地降落在北京机场，那是第一次有台湾的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看得我心情激动无比。后来几年，我也有机会坐那种春节包机了，反倒没那么激动了。

就这样，早上看完一部影片，就差不多吃中午饭了。吃完饭后午休，下午再看一部影片，就吃晚餐了。晚餐后，各自归位，行程如前。这时候你就会想：“啊！一天又过去了。”

除夕当天，照例请外面进来办桌，十一道菜，席间觥筹交错，酒酣饭饱后还是一样上了四楼。队长意思意思，给每个人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感觉就像被摸摸头一样：“乖喔！过几天就放假喽。”

当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是近几年来除夕最早睡的一次。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此起彼落的爆竹声。“啊，过年了！”却又懒得睁开眼睛，遂翻个身，带着一丝丝失落感继续睡下去。

隔天初一，“总司令”要来发红包，从营长以下都乖乖地在旁边列队欢迎。过了不久，“总司令”坐车来了。他的官邸离本队只有一墙之隔，所以便衣哨也算是在给他们家站岗。我们在服役期间遇到两任“空军总司令”，前一任是个翩翩儒将，夫人也气质高雅，后来这个“总司令”跑去当“参谋总长”了。后一任让人印象深刻，就跟普通中年发福的大叔没两样，江湖味十足但又对人亲切，夫人也跟邻家那种啰嗦的爱关心人的大妈一样，我们常常看到“总司令”晚上一个人穿着白色汗衫短裤骑着小绵羊摩托车就出去买珍珠奶茶了，一点儿都不起眼。两任“总司令”的气质非常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是开战斗机出身，另一个是开运输机出身的原因。

“总司令”一人又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我觉得发红包真是一件尴尬的事，当时倒也没人讲什么话，可是发完了，就有人觉得少。人真是难做。

过年这几天大致就是这样过的。但话说回来，因为觉得看影片挺无聊的，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还是躲在楼下看书。偶尔，还会听到办公室传来 A 片的淫声浪语，可能是大家都太苦闷了。另一方面，大概觉得过年了可以散漫一点，就把电脑的喇叭开到最大，淫靡的气氛遂在空无一人的回廊中荡漾……

另外，所谓的“留守加菜金”也被我们拿来吃喝玩乐，边看影片边吃炸鸡比萨之类的。

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过到最后，我居然开始感到心虚：

“当兵真的可以这么爽吗？”直到留守结束的初二晚上，就看到一帮人一脸大便样地回来接替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5 年到大陆旅行

退伍后不久，我没有直接找工作，而是又跑去大陆旅行。又是一次没有目的的旅行，带了当兵时存的一些钱，在家人有点儿反对的情况下上路了。

我先是到了深圳，然后坐大巴，清晨到了厦门，租了一间短期房。没想到过几天闽北遭遇特大暴雨，往北交通中断，结果我在厦门待了一个星期。厦门是个讲闽南语就能沟通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婉约秀气，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美丽的风景，也存在于闽南人敦厚的个性里。这样的性格，显现在公交车的让座里，显现在与人日常的对话中，显现在城市的干净整洁里，也显现在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里。因此，相对于其他都市的喧嚣及匆忙，厦门就多了一份安静及闲逸。

去厦门，当然去了美丽的鼓浪屿。后来几年到过南洋之后，才发现南洋那些老厦门移民对这座小岛的情感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后来，混进厦大去听台研所的讲座，发现厦大台研所的研究果然如传说中那样最贴近台湾实情。那天是知名的陈孔立教授主讲，分析连宋访问大陆后两岸的情势发展。现在看来，他在那时就能冷静地几乎完全预测到后来几年台湾政局的发展，并且说明，当时大陆政府对台的政策已经是“不表态不介入”，就是选举时不说话，让台湾自己玩去。但

当时民进党人还没发现这一点，每次选举都还想激怒大陆以博取同情，事实证明这些伎俩已经没用了。

厦门之后，我到了南昌，看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第一次到南昌，看了八一起义纪念馆与滕王阁。南昌比起其他省会都市，给人比较旧的感觉，许多房子看起来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灰灰黑黑的建筑。在火车上我与一堆南昌人聊起这些事，他们自己认为也许这是革命老区的通病。

但是南昌的餐饮业真的很火爆，到处都是餐厅。我看到南昌许多的新房正在建筑，另外也有许多旧房正被推倒。也许南昌的发展起步在同级城市中比较慢，但未来应该会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奋起直追。

我在南昌待了一天，当晚坐火车往杭州转往宁波。受了余秋雨那篇《风雨天一阁》的感召，我特地再去宁波看了天一阁。

但后来比天一阁更吸引我的是月湖。“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月湖位于宁波老三区市中心的海曙之地，四周被热闹的市区包围，中间也被路桥切为一半，但岸边垂柳婆娑飘飘，清风扑面，曲径深流，水道静谧，亦有花溪石拱桥，颇有大隐隐于市之姿。月湖水波逸韵，在湖边小坐，时有清凉之感。虽然月湖比起

杭州西湖小了很多又不那么出名，却又更生活化，在偶有微风吹皱如镜湖水的夜里，湖畔的烧烤、茶余饭后的乘凉、一家大小的散步、铺席纳凉而睡，都诉说了月湖的可亲。

我喜欢宁波那种典型的江南城市的气氛，随处可见的那种小水道般的细细流水，三五个老人在岸边搬椅搬桌而坐，打牌品茶，快意纳凉。

我在宁波待了一天，坐大巴经沪杭甬高速来到上海。没想到那几天遇到高温黑色警报，我却又一直在太阳下走来走去，后来几天严重脱皮。我在上海五天，看了一些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就离开往山东去了。第一次进入齐鲁大地，首站是曲阜。这座城市的商业看起来没其他城市那么发达，比较大的商场几乎没有，大多是中小型的。而许多店的灯光也不是特别明亮，开了日光灯却呈现一种有点儿昏暗的气氛。走在路上，除了一般市民很容易认出来外，有很大部分都是观光客。在这里，尽其一切“消费”孔子就对了，就连大排档名或小吃也喜欢取如“孔府”、“孔门”之类的名称。沿桌卖艺的乐手拿的都是简易版的古琴，击出来的音乐都是古乐，真让人禁不住感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呀！

儒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阴影随着圣人家门的开放而逐渐消散。也许这两年兴起的国学热，终于让孔夫子的思想不再带有沉重包袱，而重新成为现代人立身处事的指导方针。

半夜，我从山脚开始爬泰山，累得跟狗一样，终于在爬完最后一阶楼梯，凉风扑面而来时大声欢呼出来。正所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想必当年李太白也是这种心情吧！不过很不幸，天阴没看到日出，整个人就瘫倒在石头上了。

下山后坐火车至青岛，几天后再往济南。青岛海岸线的市区景色是极佳的，从古典优雅绿树红瓦的青岛一直到现代化的高楼青岛，山、海、城，尽收眼底，融为一体。若薄雾迷蒙，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迷离。青岛整个市区的建设就依着地势坡峦起伏，逐层而建。如果从海上看青岛，野味的海风，蓝色的海波，绿色的山坡连成一片，山坡上红色的屋瓦散落，又整齐地叠在其中。众所皆知，这是德国人规划的城市，因此充满了想象中的异国情调。

而济南的旧市区又是另一派风景了，在这里有灰砖、乌瓦、黑门。小户门楼，或大户人家，无不给人苍凉的安静之感，无不带着岁月的痕迹。但隐藏其中的处

处泉水各有特色，汨汨地从泉眼流泻而出，在民居之间串流，再合流入大明湖，醇美而令人回味，如同这个城市，朴实但渐渐发现她的美妙而令人流连忘返。济南不是秀气的江南，而是直爽朴实的北方城市，但又因为有泉水缓缓流过而温柔，使她刚柔并济。济南自古以来以泉闻名，如同这个城市的灵魂与精神般，令多少文人雅士魂牵梦萦。真无法想象，如果济南少了泉水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离开山东后到了北京，托朋友的福，这次得以深入北京的各大街小巷。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也见了许多长期不见的朋友。之后，我就往河南去了。

清晨我在新乡下火车，搭小巴往辉县去，再转车往北寨，最后坐摩的到郭亮，进入太行山区。夜宿一日后，第二天早上 9 点半开始步行至南坪。约 12 点到达，在南坪待了一晚，隔天穿越昆山挂壁公路，进入山西境内。太行山势绝壁连绵，危岩相叠，但走在其上可说是移步换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当天下午我到了王莽岭下的锡崖沟，途经锡崖挂壁公路。此段公路，在同一个悬壁上盘旋了三层，可说是

鬼斧神工。我在遗世独立的沟内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离开当地，经山西陵川县再绕回郑州。

郑州这座位于中原的北方城市，虽然比东边的开封、西边的洛阳历史悠久许多，但就是给人缺少一点儿文化底蕴的感觉，在中国的各大都市中，并没有给人特别的印象。提到郑州，在我以前的印象中总是只能想到京广线跟陇海线的交会点，一下子就没话好讲了，总觉得郑州根本就是一个特大的单位院子而已。但话说回来，郑州的绿化还是蛮成功的，法国梧桐的随风摇曳，到底使这座朴素而大气的城市有了点儿优雅的感觉。

在郑州参观了河南省博物馆以及二七塔附近的街道后，我隔天晚上就往洛阳去了。

洛阳被洛河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当然古代的洛阳城大概也是这个格局的，现在河以北是传统的旧市区市中心，以南旧城墙外是新开发区。

我参观了洛阳的王牌景点龙门石窟群，在远处即可很明显地看到大大小小的洞窟石龕，或浅或深，如蜂窝般排列。上面的佛像，或立体地神采飞扬跃出石面，或浅浅地表情拘谨浮雕于石上，各有姿态。架在石壁上的楼梯栈道上下起伏，爬起来也挺吃力的。时至中

午，烈日当头，真难想象当初几百年间，多少工匠在此，不知流下多少汗水，才完成了这艺术史上不朽的历史集体创作。

龙门石窟里的奉仙寺那几尊雄伟的大佛与其他人物，代表武则天时代以及历史上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盛唐时期大帝国的恢宏气度。据说这尊佛是照着武氏的面形雕造的，意味着武则天成佛化身的地位，但在佛慈祥又带点儿神秘的眼神注视下，却让人深深感到自己如同孙悟空逃不出佛的手掌心般渺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渺小，更是一种面对人类艺术巅峰之作时，感受到的精神上的渺小。

在洛阳的第三天早上我参观了白马寺，下午继续往西安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西安。西安一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钟鼓楼以及南大街，这次发现南大街的夜色更为美丽，霓虹灯更为绚烂迷离。到了晚上约 10 点，路上人潮依然川流不息，充满朝气而热闹异常，夜生活挺发达，这完全跟一般古都的印象不同。而让我一直在意的是，西安的女人是那样的美丽，就是那种轮廓较深的美丽，活脱脱都像陈红扮演的唐朝美女般那样的婀娜多姿，看得我眼花缭乱。

本来想去爬华山的，但我一想到之前爬泰山时的惨烈，遂打消念头，但到现在又后悔不已。在西安时我认识了一个六十几岁的希腊老头，骑着脚踏车一路从希腊出发，经过中亚到了西安，要继续环游世界，那几天还上了西安当地的报纸。

我在西安休息了几天，一解一路奔波之苦。之后往北到了延安，一路见识了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的黄土高原。

那几年很流行“红色旅游”，顾名思义，就是游览一些与中共历史有关的景点，借此“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延安当然是红色旅游第一首选了，重要的景点有枣园、杨家坪、清凉山、王家坪等。

离开延安去壶口瀑布。站在瀑边才感受到照片上无法感受到的震撼力。黄河在壶口这一段，本来数百米宽的河床突然收束到只有 50 米，巨流被挤压的结果就是，水势在此如涌如喷，如天崩地裂般飞流而下。此处地势如同壶之口，因此得名。站在瀑布面前感受，正所谓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瀑水冲击至水底，如同巨龙滚水冒起浓烟，阵阵扑面而来，像是要把人拉入水中一样。其声势又如惊天雷鸣，轰轰如大军压境，

荡荡壶口，让观瀑者无不胆战心惊，被这气势压得不自觉地无法动弹而腿软。

离开壶口回到西安，我又休息了一天。本来考虑继续西行到甘肃再南下四川的，但因时间关系，我遂决定从西安经 108 国道直接下四川。

108 国道西安至汉中段，要越过秦岭，车子就一直在山里绕呀绕的。想韩信当年逃到南郑，想着不能走官道，于是在这荒山野岭里也是绕呀绕，还杀了个倒霉路人才找到路。又如刘邦，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久居关中之地，对秦岭的另一面完全陌生，怪不得他把前往蜀地视为畏途。过了秦岭，果然，不管是植被还是种植作物，都与山北面有很大的不同，就连这里人的口音都比较偏向四川，一般人对陕西的刻板印象到了汉中却在一瞬间瓦解。

汉中现在是不起眼的小城，但充满了历史文化氛围。地处于秦岭及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关中入蜀要道中的重要都市，又因滚滚汉水向东南去而入荆吴，形成了其四通八达的交通转运站的重要位置。在承平时期，汉中是各地商贾人货来往的要地，在战时，尤其像东汉末期这种群雄割据的时代，更显出其战略重要性。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政治文化中

心以及军事地理重心不断转移，汉中的位置也慢慢被人所忽略，跟上面所说的一样，若不是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汉中老早就跟一般的城市没什么两样了。在汉中，我去了石门峡，再去定军山下的诸葛孔明墓，第三天早上离开。

我继续南下，进了四川，在昭化这个小古城休息了一晚，继续前往成都。

第三次到成都，我也没有特地想要到哪里玩，整天就是到处闲晃着，晚上再跟朋友出去喝喝茶吃吃大排档。外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生命，但我而言，一方面是在一路奔波中暂时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有个借口，好好懒散地感受一下成都这舒服的都市。

到成都那一天，正好是第二次“超女”五进三的决赛，就连大巴上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成都街上的美女依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街上有许多歌迷们自发组成的拉票团体，拿着自己制作的海报到处向路人拉票。其中还是张靓颖的歌迷声势最浩大，到处都看得到，就连我的手机都被借去投票了。当晚，热闹的春熙路突然人群为之一空，大家都跑回去看超女了。

在成都四天，我略过重庆直接去了武汉。又赶上武汉最热的时节，整个就是郁闷。但直到坐公交车上长江大桥，一阵强风扑来，宽广大气的长江再度出现在面前时，心情又豁然开朗了起来。这一刻，我才如同猛然醒来，有到了武汉的感觉。

武汉已来过多次，但这回是我第一次搭了长江渡轮。我在武汉只待一天而已，当晚就搭车往南京去，再转回上海了。离开前我还抢了 10 分钟跑去吃热干面。回到上海，跟一群上海的朋友去崂山玩。其实想想，上海人还挺可怜的，附近没什么漂亮的海岸线，只有那个人工的碧海金沙。想要看看美丽的海，远一点儿得到海南三亚，要不就是到青岛去，但如果时间不够多，又想到海边玩，大概只能到上述几个离长江口“稍远一点点”的岛屿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苦闷。很庆幸，跟着他们感受了这种苦闷。虽然这里也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海也普普通通的。比较特别的历史古迹嘛……没有！要如其他地方硬要编出什么动人的传说故事，我看也很难。但偶尔来海边看看，还是不错的。回上海后，又待了半个月，然后结束这趟旅程，回台湾乖乖工作去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7]

1987 1987 年的台湾社会

1987 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年底的南非航空 747 失事事件。这架由台湾飞往南非的班机，在经过东非海岸模里西斯（大陆称“毛里求斯”）附近时爆炸失事，全机罹难。因为机上有不少南非华侨，再加上是由台湾起飞的，因此格外受人关注，后来还在机场附近建了一个纪念碑。

没想到这件事的隔天，又发生了朝鲜女特工金贤姬炸毁大韩航空客机的事件。两起空难掀起了大众对飞机的高度恐惧，好一阵子旅游业都很萧条。

这年发生的陆正绑架案，也是台湾第一起学童遭绑架撕票案，震惊全岛。虽然主嫌被判了两个死刑，但是一直没有执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全台湾的家长简直人人自危，到学校接小孩下课的家长一下多了起来，有些比较有钱的家长是开车来接送的，但也会故意开一辆比较破的车子。以前妈妈总是说，有钱人容易被绑架，没想到现在一般家庭也开始有这种烦恼了。

《倩女幽魂》也在 1987 年上映，算是当年最轰动的电影。对宁采臣与小倩的唯美爱情印象不深，不过我喜欢把软的侧背书包往头上一戴，“你看，宁采臣耶！”当时小学的扫地时间，倒是可以看到一堆死小孩挥着拖把不断转圈，学燕赤霞在那大唱“道道道……非常道……”结果拖把上的水洒了老师一脸。

“很喜欢道道道是吧？给我用毛笔抄一百遍！”师大怒云。

“老师！什么是 Y 道？”

“算了算了，去走廊上罚站。”

《倩女幽魂》剧照

而前一年《英雄本色》里小马哥的潇洒形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衣墨镜成为许多人在模仿秀及变装秀时的打扮。在小学里，一群小孩穿着爸爸的风衣，几乎可以拖地了，但里面穿的是短裤校服，风衣一飘，反而像个变态一样猥琐。年纪大一点儿的小混混，喜欢跟小马哥一样摆阔，拿百元美钞点烟，但是他们不可能真的拿百元美钞，这下又成了被耻笑的对象。

《英雄本色》里周润发的酷造型

那也是僵尸片当道的时代。从几年前开始的《暂时停止呼吸》开始，有点儿恐怖又有点儿喜感的僵尸电影流行一时，林正英也与灵幻道士画上了等号。僵尸片影响所及，后来有好一阵子，台湾的小学生间有种传闻，台湾嘉义某某地出现了僵尸，已经有好几个人受害了，并且那个僵尸正在慢慢地北上，搞得大家都在练习憋气。而问某人是从哪里听来的，每一个人都说是“我乡下的亲戚”说的，搞得老师也不得不赶紧出来辟谣。等到上了大学后，同学来自台湾各地，说到这件事才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同样的回忆，只不过住北部的同学听到的是僵尸往北部跑，住南部的同学听到的是僵尸往南部跑。

在引进电影方面，《末代皇帝》的上映，掀起一股话题，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故宫。《太阳帝国》也在这一年上映，不过里面有一幕，日军进入上海时，蒋中正的像被取了下来，却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差点儿被剪掉。

这里不得不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电影四大女星：王祖贤，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这四位各有拥护的影迷，又互相攻击。王祖贤气质脱俗，张曼玉清纯可爱，钟楚红成熟动人，关之琳美丽大方，当时许多人喜欢在摩托车后方装一块有女星照片的挡泥板，以至于每次我看到王祖贤脸上被泼了一块泥，都想帮她擦擦。到了今日，王祖贤消失了，钟楚红最早嫁人，张曼玉跟外国男友同居了，只剩下关之琳还在拍电视购物广告。

录像带出租店

在过去，台湾一般家庭想要看影片，除了第四台和电视台经过配音的影片外，只能到录影带（录像带）店去租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除了电视以外，录放影机也是必备的。而录影带有大带（VHS）与小带（BETA）的区别，各有支持的厂商，有点儿像现在的蓝光 DVD 和 HD 的规格之争。小带的优点是画质较清晰，但放映时间较短；大带反之，不过后来 VHS 赢了，所以大家后来都用 VHS 大带。

因为一块录影带大概也都要当时的三百多块钱，不太便宜，因此出租录影带的行业应运而生。在这类出租店里的影片主要有几大类：欧美电影，台产电影，综艺节目（通常是私录的），港剧，卡通，日本节目（含摔角、综艺节目、剧集等）。大部分人要租的话需要交一笔押金及预付金，然后再从这里慢慢扣钱。当然啦，成人影片也是个很大的市场，业主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但是警察会抓的，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录影带店都有一个小隔间或暗室藏在成柜的录影带架后面，通常老板见到熟客才会帮他们打开这个暗门。那时候多想进去啊，每次门只要微微打开，我都会假装在旁边选片，事实上是在往里面一探究竟！那对我来说简直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天国之门，不过我那时候还是个发育不良的小孩，说是帮爸爸租的也没有人会相信。

录影带的影片与节目，陪我度过了很多没有第四台及电脑的童年时光。我尤其喜欢租日本综艺节目来看，因为不管制作还是喜感，都比台湾的综艺节目好多了。再说，台湾的节目也都是模仿日本的。那时比较喜欢的有志村加藤的“大爆笑”以及整人节目。

因为录影带是可重复读写的，但每次新存入又无法把旧的都覆盖干净，所以一些私自录制的影片偶尔也会出现些让人尴尬的场面。比如说，全家看小叮系列，大雄与恐龙看到一半，好感动的时候，突然宜静发出激情的呻吟声，然后脸一扭曲，画面变成了某种运动的场面，全家当场傻眼，默不作声地继续低头吃饭。等到画面又回到小叮时，妈妈总算松了一口气，忍不住说：“喔！你看你快看，小叮又出来了。”

这种情况常有发生，害我到现在一直怀疑那时候是不是片名少看了两个字，其实片名是《激情小叮》。另外一种情况是，小时候好奇心比较强，片子完了之后，后面还有一段雾沙沙的画面，想看看后面还有什么，结果一直快转，有一次还真的看到了以前录过没清洗掉的画面。喔喔喔！有好多日本女人没穿衣服呢！赚到了赚到了！从此，我看录影带都会看到它全部放完为止。

我家有录放影机的时候，也正值我性启蒙之时，很想去租一些黄片来看，可是老板又不让我进密室，所以只能租些片名比较意淫的片子，而且租的时候一定把这部片夹在其他片中间，可能又顺便附上一片自己都看不懂的艺术片做烟幕弹。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无良

心的录影带商人，取名字特别有技巧，比如说《世界性娱乐》这部片，它的“性”字放得特别大，封面又放着比较诱人的图片，而且在一般区出租。等回到家一看，什么？内容竟是各国的花车游行啊，马戏杂耍啊之类的，原来内容是“世界性的娱乐”啊！

有时候出租店也会办促销，通常都是港剧系列，比如一次租十片会更便宜，但是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都一次租一袋子装的港剧，疯狂看港剧赶进度，看到眼睛出油、眼压升高都在所不惜。而录影带店倒掉也是常有的事，这时候就会大喊赚到赚到了，不过妈妈马上泼冷水：“可是还有五百块预付金嘞！”

后来，这些个人经营的录影带出租店慢慢被大型连锁的出租店如百事达所取代。再到后来，录影带也慢慢被 VCD、DVD 所取代了。